

ISSN 2424-0869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研究

No.9

The Academic Journal
Of
SETACS
2024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協会
Tokyo
Beijing-Dalian-Jinhua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研究 The Academic Journal Of SETACS

No.9 2024

SETACS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協会

定価 [本体 2,500 円+税]

目 次

政治文献汉译日中的“一词多译”现象及原因探析 ···· 祁福鼎, 尹 瑛	3
译注在翻译中的文化形象建构功能探析 ——以《古事记》英译本为例 ····· 邓凌志	13
『ノルウェイの森』の中国語翻訳ストラテジー比較研究····· 张秀阁	22
多译本比较视角下日语拟声拟态词翻译的主观性识解 ··· 熊 磊, 刘臻胜	32
松冈荣志新译《诗经》的颜色词体认构建 ····· 左玉林, 卢冬丽	39
論文執筆者一覧 ·····	49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研究』論文執筆要領 ·····	49
協会彙報 ·····	50
一般社団法人日中翻訳文化教育協会会員規約 ·····	51
2023 年度役員 ·····	51

INDEX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and Reasons of "Multiple Translations of One Word" in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o Japanese	QI Fuding, YIN Ying	3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Image Construction Function on Annotations in Translation ——Tak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 <i>KOJIKI</i> " as an Example	DENG Lingzhi	13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i>Norwegian Wood</i>	ZHANG Xiuge	22
Subjective Construal in Translating Japanese Onomatopoeia and Mimetic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Translations	XIONG Lei, LIU Zhensheng	32
The Embodied Construction of Color Word Recognition in Eiji Matsuoka's New Translation of <i>the Book of Songs</i>	ZUO Yulin, LU Dongli	39

政治文献汉译日中的“一词多译”现象及原因探析

祁福鼎

尹瑛

大连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精神”、“中国声音”也愈发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要提升国际传播效能。2019年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1]2021年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再次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2]。

政治文献翻译作为宣传国家大政方针、展现国家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媒介,其翻译质量和翻译效果对于能否有效地传播中国声音、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文献的外译是我国外宣、国际传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准确传达政治文献的精神内涵,有效传播原文信息对于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至关重要。

政治文献又称为中央文献或党政文献,一般指“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政策文件”和“国家党政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3],根据纽马克的文本分类理论,属于“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中的“官方文告(authoritative statements)”^[4]。由于中日两国在语言、文化、立场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在政治文献翻译中“一词多译”现象屡见不鲜。“一词多译”是指源语言词在目标语言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翻译。如“新发展格局”一词在二十大报告(2022)和政府工作报告(2022、2023)中译为「新たな発展の形」,而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2023)中译为「新たな発展モデル」,在人民网日语版和驻日大使馆的官网中还存在诸如「新発展構造」「新たな発展局面」「新しい発展の枠組み」等不同译法。为什么同一政治术语会产生多种不同的译法?哪些情况下会出现“一词多译”现象?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考察了政治文献翻译中的“一词多译”现象及其原因,希望能为我国政治文献翻译及翻译研究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随着国家对政治外宣翻译的愈发重视,政治文献的翻译问题也成为诸多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程镇球(2003)强调“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必须紧扣原文,不得任意增减”^[5]。黄友义(2004)指出外宣翻译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

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6]。修刚（2018）结合十九大报告日译工作的实际经验，认为中央文献翻译的首要原则是“必须恪守忠实性和政治性”，做到“准确达意、不缺不漏、规范统一”，同时，“也需要灵活运用翻译技巧，积极吸收采纳对象国地道、自然的表达方式和常用词汇，使译文更加符合受众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7]范大祺（2021）提到党政文献翻译应坚持“忠实精准”和“贴切达意”的两大原则。“党政文献翻译最最看重的就是准确性，宁可少传播，不能传播错。而且只要一锤定音，不能来回变化，从而让外国读者在可读性之外失去可信度。”^[8]可见，“忠实性”原则是政治文献翻译中译者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之一。

笔者对诸多政治文献的日文译本进行整理发现同一源语在目的语中对应多种译法，即“一词多译”的现象并不少见。国内许多学者也关注到政治文献翻译中的“一词多译”问题。例如，卿学民（2018）以“人民当家作主”在不同时期、不同文献中的日译为例探讨了政治文献重要术语外译的理论逻辑，从语义语法和理论逻辑两方面对“人民当家作主”的不同译法进行了分析。范大祺（2021）结合2021年两会文献日译，指出了“脱贫攻坚战”在不同时期译法的变化。陈会林、何佳欣（2023）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治理”一词的译文进行了统计，从显化翻译策略研究的角度对该词的不同译法进行了探讨。

三、研究语料及研究方法

如上所述，“一词多译”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讨论大多仍停留在个案研究，缺乏从整体、宏观层面进行梳理与分析。鉴于此，本文以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报告、2016-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四卷）等权威政治文献的中日对译资料为语料，采用归纳法和比较法，对政治文献汉译日时的“一词多译”现象进行调查，并从源语的“一词多义”、惯用搭配不同、句法成分不同、翻译时期不同及翻译机构不同等层面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探析。通过对“一词多译”现象的成因分析，指明译者在翻译政治文献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以期抛砖引玉，为今后的政治文献翻译及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四、“一词多译”现象及原因分析

4.1 源语的“一词多义”

“一词多义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9]，在中日两种语言中都大量存在“一词多义”的情况。政治文献翻译要求在意义传达上高度忠实于原文，精准传递原文的实质内涵，译者必须准确把握词汇在源语中不同语境下的实际含义，审慎选择合适的义项进行对译。如：

案例1：文明

“文明”是政治文献中的高频词汇，笔者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2023）中的“文明”一词进行统计，共发现150处。根据该词在原文中所表示的不同含义，译文中采用了诸如「文明」「文明的」「文化的」「理性的」等不同的译法。

例 1：

【原文】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p10）

【译文】われわれは、中国の特色ある社会主義を堅持し発展させ、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エコ文明の調和のとれた発展を推進し、中国式現代化の新たな道を開拓し、人類文明の新たな形を創造してきた。（『習近平 国政運営を語る』第四卷 p10）

例 2：

【原文】要培育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的诚信文化，教育引导资本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走人间正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p220）

【译文】文明のかつ健全で、向上し善行に励む信用文化を育み、資本主体が社会主義の中核的価値観を实践し、信用・信義を重視し、社会的責任を重んじ、この世の正道を歩むよう教育し、導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習近平 国政運営を語る』第四卷 p240）

例 3：

【原文】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绿色低碳消费，鼓励绿色出行，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示范创建，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生态环保意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p374）

【译文】簡素で適度の、グリーン・低炭素型の、文化的で健康的なライフスタイルを提唱し、グリーン・低炭素型消費を誘導し、グリーン移動を奨励し、グリーン・低炭素社会を目指す行動モデルの創出に取り組み、全国民の節約意識、生態環境保護意識を強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習近平 国政運営を語る』第四卷 p408）

例 4：

【原文】要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p294）

【译文】厳格で規範化された公正かつ理性的な法執行を推進し、司法の信頼性を高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習近平 国政運営を語る』第四卷 p320）

上述案例中“文明”一词出现多种不同译法，虽然日语中也存在中日同形词「文明」，但译文中并没有全部用「文明」进行对译。“文明”一词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2016）中，“文明”有以下三种义项：①名词，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②形容词，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③形容词，旧时指有西方现代色彩的（风俗、习惯、事物）。而『日本国語大辞典』中对「文明」解释如下：“『名』文教が盛んで人知が明らかになり、精神的・物質的に生活が快適である状態。特に、宗教・道徳・学問・芸術などの精神的な文化に対して、技術・機械の発達や社会制度の整備などによる経済的・物質的文化をさす。”研究发现，当该词在原文中作一般名词或专有名词使用，表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体现社会发展进步的某种成果”时，如例1中的“政治文明”“生

态文明”等，通常直译为日语中的「文明」。而像例2、3中的“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的诚信文化”、“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中的“文明”作定语修饰其后的“诚信文化”、“生活方式”，则译为「文明的」「文化的」。另外，例4中的“文明执法”指的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防止粗暴执法、过度执法、机械执法、促进执法和谐”¹⁾，根据这一内涵，译文中采用了「理性的」这一译法。

案例2：严肃

例5：

【原文】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十九大报告 p51）

【译文】およそ大衆の強い不満を買った問題なら厳肅かつ真剣に対応し、およそ大衆の利益を損なった行為なら断固として是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における報告 p53）

例6：

【原文】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二十大报告 p52）

【译文】指導幹部の配偶者、子女、子女の配偶者などの家族や側近がその影響力を利用して私利を貪る問題を断固調査して処罰し、贈収賄の同時摘発を堅持し、これまでにない形の腐敗と隠れた腐敗を処罰す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における報告 p53）

例7：

【原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十九大报告 p21）

【译文】党内政治生活を引き締め、党の規律を厳正にし、党内の監督を強化し、党内で積極的かつ健全な政治文化を發展させ、党内の政治生態を全面的に浄化し、さまざまな不正の気風を断固是正し、「ゼロ容認」の姿勢で腐敗を処罰し、党の自己浄化・自己改善・自己革新・自己向上の能力を不断に強化し、党と人民大衆との血肉のつながりをつねに保ち続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における報告 p20-21）

“严肃”一词在汉语中既可以作形容词，表示“作风、态度等严格认真”，也可以作动词，表示“使严肃”。例5、6中的“严肃”意为“认真地（对待）”“严格地（查处）”，因此分别译为了「厳肅」「断固」。例7中的“严肃”作动词，意为“使党内政治生活严肃”，所以日语中采用「引き締める」这一动词对译。

4.2 惯用搭配不同

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各自特有的思维方式，两国语言也有着各自习

惯的表达方式和搭配习惯，因此在翻译时，需要考虑日语的搭配习惯，选择合适的译词，不能只按照原文字面一概而“译”。

案例3：建设

例8：

【原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二十大报告 p53）

【译文】社会主義現代化国家を全面的に建設するために、中華民族の偉大な復興を全面的に推進するために、団結奮闘しようではないか。（中国共産党第二十回全国代表大会における報告 p55）

例9：

【原文】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二十大报告 p49）

【译文】民族復興の重責を全うする資質の高い幹部を育成する。（中国共産党第二十回全国代表大会における報告 p50）

例10：

【原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二十大报告 p22）

【译文】金融体制改革を深化させ、現代の中央銀行制度を確立し、現代の金融監督管理を強化し充実させ、金融安定化保障体系を強化し、法に基づいて監督管理をすべての金融活動に行き渡らせ、系統性リスクを生じさせないという最低ラインを守り抜く。（中国共産党第二十回全国代表大会における報告 p22）

上述案例中，“建设”一词分别搭配了“国家”“干部队伍”“制度”三个不同的宾语，译文按照日语的搭配习惯采取了不同的译法。日语中的「建設」通常搭配「建物」「施設」「道路」等建筑设施类名词或「国家」「社会」等机构组织类名词，所以例8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译为「社会主義現代化国家を建設する」，而例9和例10按照日语搭配习惯则不宜直接译为「建設する」。例9“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意为“培育高素质干部人才”，例10“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意为“确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译文没有囿于原文的字面意思，而是根据原文词汇表达的实际含义选择了符合日语搭配习惯的方式对译。除上述例文外，“建设”根据搭配对象不同，还有「現代化経済体系の整備（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辺境地区の開発（边疆地区建设）」、「教材の作成（教材建设）」、「未成年者の思想道德形成（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多种译法。

4.3 句法成分不同

政治文献的“表达性”要素“决定其翻译应尽可能贴近原文语义结构和内容”^[3]，同一词语在原文中充当的句法成分不同也会影响到译文中译词的选择。

案例4：坚定

例11：

【原文】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p50）

【译文】理想・信念の揺るぎなさは思想・理論の揺るぎなさから来る。（『習近平 国政運営を語る』第二卷 p55）

例 12：

【原文】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p78）

【译文】中国は一貫して防御的国防政策を取っており、中国の軍隊は常に世界平和を守る揺るぎないパワーである。（『習近平 国政運営を語る』第四卷 p83）

例 13：

【原文】心怀“国之大者”，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p39）

【译文】国家の大事を心に抱き、「四つの意識」を強め、「四つの自信」を固め、「二つの擁護」をやり遂げることを着実に行動に移そう（『習近平 国政運営を語る』第四卷 p41）

例 14：

【原文】我们将拓展同世界各国的互利互惠合作，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运转，共同推动世界经济早日重现繁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p106）

【译文】われわれは世界各国との互惠・協力を拡大し、引き続き経済のグローバル化を推進し、多国間貿易体制を確固として守り、世界の産業チェーン・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安全かつ円滑な運営を守り、世界経済の一日も早い繁栄回復を共に推進していく。（『習近平 国政運営を語る』第四卷 p115）

上述案例中，“坚定”一词在原文中充当了不同的句法成分。例 11 中“理想信念的坚定”为主语，“坚定”译为名词「揺るぎなさ」；例 12 中作定语，日语用形容词「揺るぎない」对译；例 13 中作谓语，日语用动词「固める」对译；例 14 中作状语，日语译为「確固として」。另外，“坚定”作谓语时还被译为「～を揺るぎないものにする」；作定语时还有「堅固な」「堅い」「確固不動の」等译法；作状语时还有「揺るぎなく」「固く」「しっかりと」「断固として」等译法。

4.4 翻译时期不同

杨雪冬（2020）指出，政治文献“在翻译重要概念时，我们坚持准确性、规范性和传承性这三个基本原则。”^[10]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不同时期的翻译方法可能会有所变化。

案例 5：共同富裕

例 15：

【原文】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十八大报告 p14）

【译文】ともに豊かになる道を堅持すること。ともに豊かになることは中国の特色ある

社会主義の根本的原則である。(中国共産党第十八回全国代表大会における報告 p16)

例 16:

【原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十九大报告 p35)

【译文】終始人民の利益を至上の地位に置き、改革・発展の成果がより多く、より公平に全人民に行き渡るようにし、全人民の共同富裕の実現に向けて絶えず邁進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中国共産党第十九回全国代表大会における報告 p36)

例 17:

【原文】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二十大报告 p17)

【译文】中国式現代化は全人民の共同富裕を目指す現代化である。共同富裕は中国の特色ある社会主義の本質的な要請であり、長い歴史的過程である。(中国共産党第二十回全国代表大会における報告 p17)

在十八大报告中，“共同富裕”采用解释性翻译的方法，译为「ともに豊かになること」，而在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中则将其视为专有名词，直译为「共同富裕」。笔者认为这种译法的转变一方面和“共同富裕”的词意内涵不断丰富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对“共同富裕”作出新的阐释：“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1]相比于早期译文，现有译法能够更加完整、充分地保留原文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特色政治词汇的翻译策略向源语文化靠近的趋势。

案例 6：“六稳”

例 18:

【原文】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 p6)

【译文】「六つの安定（雇用・金融・貿易・外資・投資・期待の安定）」の取り組みに力を入れ、雇用、基本的民生、市場主体、食糧・エネルギー安全、産業チェーン・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安定、末端の行政運営を保障し、揺るぐことなく内需拡大戦略を実施し、経済の発展と社会の安定という大局を維持し、貧困脱却堅塁攻略の決戦に勝利する目標・任務の完遂、小康社会の全面的完成を確保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2020 年政府活動報告 p6)

例 19:

【原文】持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强化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以改革开放办法推动经济爬坡过坎、持续前行。(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 p8)

【译文】持続的に「六つの安定」と「六つの保障」にしっかりと取り組み、雇用、基本

的民生、市場主体、食糧・エネルギー安全保障、産業チェーン・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安定、末端の行政運営への保障を強化し、改革開放の方法で経済が困難の中でも安定的に成長するよう促した。(2023 年政府活動報告 p8)

“六稳”的翻译早期使用“直译+注释”的翻译方法，如 2020-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但在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采取了「六つの安定」的译法，省略了注释内容，主要是考虑到受众已经了解该表达的内涵。类似上述随着时代演变，取消注释内容的翻译策略变化还有“一带一路”、“小康社会”等中国特色政治术语的翻译。“一带一路”、“小康社会”在刚提出时多采取“直译+注释”或“解释性翻译”的方法，后来随着该提法反复出现，考虑到受众对其概念已逐渐熟悉，从而省略了对词语的日语解释，固定为「一带一路」「小康社会」的专有译法。

4.5 翻译机构不同

政治文献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译者主体的影响。研究发现，同一表述在不同翻译机构产出的译文中有时存在不同译法。例如：

案例 7：颠覆性技术创新

例 20：

【原文】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十九大报告 p25)

【译文】応用型基礎研究を強め、国家重要科学技術プログラムを拡充して実施し、ジェネリック・キーテクノロジー研究、先端・先導技術、現代工学技術、革命的なイノベーションを際立たせ、科学技術強国・品質強国・宇宙開発強国・インターネット強国・交通強国・デジタル中国・スマート社会の建設に力強い支えを提供する。(中国共産党第十九回全国代表大会における報告——新華社)

【译文】応用型基礎研究を強め、国家重要科学技術プログラムを拡充して実施し、ジェネリック・キーテクノロジー研究、先端・先導技術、現代工学技術、破壊的技術革新を際立たせ、科学技術強国・品質強国・宇宙開発強国・インターネット強国・交通強国・デジタル中国・スマート社会の建設に力強い支えを提供する。(中国共産党第十九回全国代表大会における報告——理論中国)

十九大报告中出现“颠覆性技术创新”一词，指的是“通过科学或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对已有传统或主流的科学原理、技术、产品、工艺流程、设计方法进行另辟蹊径的革新技术，可以产生重塑人类生活、工业生产、商业消费模式乃至全球经济的革命性、颠覆性进步，具有替代性、破坏性、高风险、高回报等显著特征”²⁾。新华社的译文采用了意译的方法，译为「革命的なイノベーション」，而理论中国日文版的译文则直译为「破壊的技術革新」。

案例 8：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例 21：

【原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译文】緑の山河は金山や銀山にほかならな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における報告 p19)

【译文】緑の山河は金山銀山。(『習近平 国政運営を語る』第二巻 p437)

【译文】緑水青山こそ金山銀山。(人民网日文版)

【译文】緑の水と青い山こそ金山、銀山である。(中国国际放送局)

【译文】緑水青山こそ金山銀山。(新华网)

【译文】緑水青山こそ金山銀山(豊かな自然は金銀同様の価値がある)。(人民中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这一重要表述,不同翻译机构采用了不同的译法,体现出不同译者在翻译同一表述时呈现出的差异化选择。

五、结语

政治文献外译作为我国对外宣传、加强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能否通过译文有效传播原文信息关系到日本受众对中国的正确认识与理解。政治文献汉译日中存在“一词多译”现象,对该现象的成因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政治文献翻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报告、2016-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四卷)等权威政治文献的中日对译资料为语料,对政治文献中的“一词多译”现象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一词多译”多出现于下述五种情况,即源语的“一词多义”、惯用搭配不同、句法成分不同、翻译时期不同,以及翻译机构不同。

综上,在翻译政治文献时,译者既要遵守忠实性原则,也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处理。“准确忠实不等于生硬翻译,考虑读者不等于放弃己方立场。”^[12]译者一方面要把握好国家立场与读者接受的统一,在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寻求最佳平衡,选取恰当的翻译方法进行翻译;另一方面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话语的海外传播。

注

- 1) 定义摘自:临泽县人民政府:【政策法规】法治建设应知应会知识(三)[EB/OL].[2023-11-23].http://www.gslz.gov.cn/ztzl/fzljzj/202309/t20230918_1113568.html.
- 2) 定义摘自: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关于颠覆性技术研发方向建议公开征集工作的常见问题解答[EB/OL].[2023-11-23].https://service.most.gov.cn/kjjh_cjwd_all/20210915/4573.html.
- 3) 本文中所选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及政府工作报告的日译例句,除有特殊备注的以外,均来自“理论中国”官网 <https://jp.theorychina.org.cn>.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奋斗,2019(06):1-5.DOI:10.16634/j.cnki.cn23-1001/d.2019.06.002.
- [2] 求是网.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书记要求下大气力[EB/OL].[2023-11-23].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21-06/02/c_1127522717.htm?ivk_sa=1023197a.
- [3] 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

- [4]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Lond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1988.
- [5] 程镇球. 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J]. 中国翻译, 2003(03):20-24.
- [6] 黄友义. 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 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 中国翻译, 2004(06):29-30.
- [7] 修刚, 李运博, 花超. 十九大报告翻译实践与中央文献的日文翻译策略[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8(02):1-7. DOI:10.13508/j.cnki.jsr.2018.02.001.
- [8] 范大祺. 党政文献翻译的现实问题与未来方案 —— 以 2021 年两会文献日译为例 [OL]. [2023-11-2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IyNTQxMw==&mid=2651057876&idx=1&sn=4304b9a39dcf312e31886e11b1b5a432&chksm=bd7c42be8a0bcb863d9c6205f3cf9bdb9bcb79d37d8225005ad6262ad0dalc00b00ce4c9baa&scene=27.
- [9] 林正军, 杨忠. 一词多义现象的历时和认知解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05):362-367+401.
- [10] 李晶. 文明互鉴·文明互译 —— 第五届“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嘉宾访谈录[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27(02):149-156.
- [11] 习近平. 扎实推动工人同富裕[J]. 中国民政, 2021(20):4-6.
- [12] 陈岩, 孟海霞. 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重要表述的日译[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8(01):1-7. DOI:10.13508/j.cnki.jsr.2018.01.001.
- [13] 卿学民. 政治文献重要术语外译的理论逻辑分析 —— 以“人民当家作主”的日译为例[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8(02):8-14. DOI:10.13508/j.cnki.jsr.2018.02.002.
- [14] 陈会林, 何佳欣. 政治文献日译的显化翻译策略研究 ——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治理”一词为例[J]. 西部学刊, 2023(12):76-79. DOI:10.16721/j.cnki.cn61-1487/c.2023.12.024.

译注在翻译中的文化形象建构功能探析

——以《古事记》英译本为例

邓凌志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0. 引言

《古事记》是日本最古老的典籍，也是日本文化的开篇之作。此书诞生于尚无日本文字表记日本语的时代，编撰者在行文上，采用古汉语、变体汉文和假名注音相杂的和汉混淆文体，“... 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即辞理叵见以注明，意况易解更非注”。这种文字记述方式使得《古事记》文本的翻译对西方人而言尤其艰难，在典籍翻译中也可算为数不多的特例之一。

目前为止，《古事记》的英语译本主要有张伯伦译本和费里比译本。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 1850-1935），19 世纪英国著名文化学者，日本研究专家。在众多的日本研究学术成果中，张伯伦的《古事记》英语译本具有里程碑意义，张译本最初于 1882 年连载于《亚洲日本学会会刊》，1906 年正式出版。美国学者费里比（Donald L. Philippi, 1930-1993）则于 1957 年得到富布赖特奖学金资助，赴日本国学院大学从事古典日语及爱伊奴语研究。他的《古事记》英译本于 1968 年出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受到众多学者的肯定和引用。

除此之外，美国当代日本学研究专家赫尔德（Gustav Heldt）教授也于 2014 年出版了《古事记》译本。为提高文本的阅读感受，他的译文中基本没有注释，因此，有学者评价说，赫尔德的版本是面向普通读者，而前两个版本（即张译本和费译本）是面向学者和研究者的（Paolo Villani, 2016: 387）。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张译本和费译本无疑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他们的译本中最突出的特征是注释丰富，张伯伦译本共有 2455 条注释，费里比译本则有 1712 条。张译本的有些译注内容极长，超过正文篇幅数倍，旁征博引，考据精深，营造了深厚的文化语境；而费里比的译注则从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对文本内容进行解释，极大拓宽了读者的视野。

从社会信息学角度来看，这些丰富的译注为译文文本带来了“信息溢出”效果，即读者通过阅读译文文本获取的信息已超过原文文本所涵盖的信息，也由此达到原文文本所预设范围之外的文化形象建构效果。张译本和费译本虽然在时空跨度上相距较远，但两者都是备受西方日本学者们所推崇的翻译著作，也分别建构起了各具特色的日本文化形象，而我国的日本学研究领域迄今鲜有对《古事记》英译本的译注及其日本文化形象建构作用的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些丰富的译注中较为集中反映出的古代日本文化形象进行剖析，展现译注的文化形象建构作用。

1. 原始宗教形象

作为日本最古老的文化典籍，《古事记》的内容混合了“帝纪”与“本辞”等文献史料内容，同时也有大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古事记》之写作目的就是整合其内容，为天皇谱系正名。诚如其序言部分所言，“撰录帝纪，讨核旧辞，削伪定实，欲流后叶”（周作人，2015：3）。

另一方面，《古事记》正文中描述了很多极具原始宗教色彩的行为活动，体现了日本的诸多原始信仰。历史上这部典籍很长时期内都由日本神道教的神职人员抄录保管，并对其中所记载的神灵行为进行诠释。《古事记》直到1644年才初次印刷出版，流入社会。而到了现代，很多研究者开始将《古事记》中诸神的各种行为视为一种原始巫术崇拜的表现，例如王金林（2007）、李广志（2010）、鎌田（2017）等人，偏向于将这些神灵的行为与萨满巫术信仰（shamanism）联系起来。费里比译本中的译注中也倾向于用这种“萨满”巫术式解读来解说《古事记》文本中诸神的行为。

而张伯伦感觉到，19世纪日本国学家们看重《古事记》，突出宣扬传统神道教义，是为了提振日本国民精神，“消除佛教及古代中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Chamberlain, 1932：1）。在张伯伦看来，神道是一种崇尚繁殖、全能神祇式的宗教信仰，“神道信仰认为神道教的这些神灵们飘渺而无处不在，整个人世间处处留下祂们的踪迹，为世人所崇拜，繁衍无穷。如同古代罗马人和希腊人，日本人信奉超世间的、原初的全知全能神灵，祂引导着人们摆脱野蛮和愚昧，走向知性与教养，教导人们不能囿于享乐，而是为了更加崇高的希望而牺牲自我”（Chamberlain, 1932：lxix）。因此，他眼中的神道教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他不愿将《古事记》中这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活动简单解读为萨满巫术，而是倾向于基于神道教的神秘性解读。

两人的不同理念在各自的译注中也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古事记》上卷中，天照大神得知弟弟须佐之男命来到自己的国土，惊曰“吾弟此来必无好意，恐欲强夺我国土”，于是“解开头发结成男髻①，... 背负千枝的箭筒，胸悬五百枝的箭筒②，... 摇动弓梢③（周作人，2015：31）”，与须佐之男会面。

费译本中主要对“解开头发结成男髻①”使用脚注进行详细解说，介绍了人类学家的阐释：“很多学者将这种行为视作侍奉太阳神的女巫侍从所表演的萨满附体仪式，在这样的仪式中，神灵的女巫侍从被神灵附身，言说出神灵的意志。天照大神原本是男性神灵，由女性萨满巫师侍奉，但天长日久之下该神灵形象附身于女巫侍从，民间遂视其为女性神灵”（Philippi, 1968：74）。而张伯伦则仅在译注中对②、③中的“箭筒”、“弓梢”等词的词源进行词源考证，未对“结成发髻”行为的象征意义进行深入探讨。

《古事记》故事情节继续发展，须佐之男命与姐姐天照大神争斗后，在高天原大行捣乱之事，甚至“倒剥天马之皮”（周作人，2015：34），张译本和费译本均在译出这些行为的表面意义后，在译注中做出了各自的解释。张译本中将这种行为解释为违反神道教禁忌的“Crime”（罪行），而费译本则将其解释为一种“Black Magic”（黑巫术），体现了两位译者对于《古事记》中神祇行为的不同解读方式。

此后天照大神受到惊吓隐身于岩户，高天原诸神汇集商讨对策，女神天宇受卖命“以

葛藤为发簪、手持天香山的竹叶束，覆空桶于岩户之外，脚踏作响，状如神凭。”（周作人，2015:16）。此处“状如神凭”一句，费里比译为“Then she became divinely possessed”（被神灵附体），“状如”一词略去不译，并在译注中解释说，从古代文献资料来看，神灵附身在古代日本是极为普遍的信仰，直到明治时期一直盛行不衰。且直到现在还盛行于琉球群岛、爱依奴、朝鲜半岛等地。鸟居等学者认为日本早期宗教是以萨满信仰作为基础的，天照大神和高天原众神的真实身份都是萨满巫师（Philippi, 1968:84）。

可以看到，费译本的注释内容引导读者向萨满巫术信仰的方向对早期日本进行解读。而张译本则直译为“as if possessed by a Deity”（装作被神灵附体的样子），并在译注中强调“此处应是故意模仿这样的姿态，而非真正被神灵附体”（Chamberlain, 1932:69）。

可以看到，张译本力求以神道教的神秘性为主导来解读文本中众神灵和人物的活动，建立起具有特殊性的日本文化形象。而费译本在译注中共有24处使用“Shaman”（萨满巫术）或“Shamanistic”（萨满巫术性的）这样的词语来解读《古事记》文本中众神的行为，这种对《古事记》中神灵活动的文化人类学视角解读使得日本古代宗教信仰在西方读者眼中具有了普遍性意义。

2. 异域世界形象

《古事记》上卷内容以上古时期神话为主，其中出现了“黄泉国”、“常世国”等异域世界形象，体现了早期日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所积累的经验与想象，张译本和费译本中都用大量译注展现出源语文本中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语境。

1) “黄泉国”

世界各民族都有各自对“死后世界”（冥界）的观念认知，构成其民族信仰中的重要一环。《古事记》上卷中讲述伊邪那美生火神（火之迦具土神）后死亡，其夫伊邪那岐追至冥界探望亡妻：“於是、欲相見其妹伊邪那美命、追往黃泉國”（周作人，2015:11）。这应是日本文献中最早言及“死后世界”的记录。通过张译本和费译本中的译注，可以看到他们建立的日本“死后世界”形象。

（1）“黄泉”概念与日本人的生死观

张译本将“黄泉”译为“Hades”（冥界），注释中多引用日本学者的解释展现黄泉国形象：本居宣长认为“地府世界，... 为死者居所，无论贫贱富贵，... 人死后的魂归之所”。日语‘よみ’（作者注：“黄泉”一词的日语训读读音）的词源来自よる（黑夜）或やみ（阴暗），故该词本意为‘晦暗之地’。但新井白石认为该词系西方 Yama 一词的讹音。综合日本神道教的精神，译者认为译成‘Hades’一词更加恰当”（Chamberlain, 1932:40）。

费译本则将“黄泉”音译为“Yomi”。Yomi 是“黄泉”一词的音译。费里比在译注中解释：很多学者认为，伊邪那岐到黄泉国探望亡妻的情节乃是受地下石室墓葬文化的影响而创作的，这种石室墓一般连接着石头堆砌而成的墓道，Kidder（Japan before Buddhism, New York: Praeger, 1959）认为这种墓室与古代欧洲的 Tumuli 古冢高度相似。

之所以说受石室墓的影响，是因为伊邪那美的尸身是在内室被丈夫发现的，且通往黄泉国的甬道入口被巨石所阻挡。据考古学家后藤周一（《日本古代史的考古学研究》，山冈书店，1947，PP11-21）考证，伊邪那岐探访亡妻的情节体现出鲜明的后古坟时代（六世纪至八世纪前期）特征（Philippi, 1968 : 61）。

在这里，两位译者的个人风格呈现出清晰的对比，费里比大量引用文化人类学者和历史研究者的成果，以现代人文学科知识构筑了丰满而多维的黄泉国形象；而张伯伦则立足于日本本土学者对自身文化的诠释，深化了日本文化元素中所折射出“黄泉国”独特形象。

（2）黄泉界与“黄泉女神”形象

《古事记》中“黄泉”之地象征着人死后所去往的世界，费里比在他的译本正文之后对这个“死后世界”以补注（Additional Notes）的形式追加了更加系统的背景信息。在补注6中，费里比对《古事记》中所表露的古代日本人“死后世界”观念做了如下评述：

- ①“黄泉世界”的社会构造较为原始；
- ②此时的日本人还没有佛家“因果报应”等观念；
- ③黄泉世界更多给人以污秽不洁、令人厌恶之感，而不是令人恐惧；
- ④邪恶及污秽皆源自此黄泉世界；

⑤黄泉世界之居民具有清醒的行为意识，他们居住房舍、饮食活动与人间并无不同，而在某些方面却与生者相异（Philippi, 1968 : 400）。

费里比的注释中，对黄泉国的分析清晰体现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野，突出了日本原生文化的普遍性元素。从他对“黄泉国”其它元素的注释也能清楚看到这一点，《古事记》上卷“黄泉国”部分中讲述伊邪那美最终成为“黄泉之神”，费译本中注释为：伊邪那美由创世女神转变为地下死亡世界的女神。其它民族的神话中也有类似的情节：大地女神（Freya、Persephone、Nerthus、Frigg）成为管辖地府亡灵的统治者（Philippi, 1968 : 66）。而张译本中此处则将“黄泉女神”直译为“Great-Deity-of-Hades”，未作进一步注释。

可以看到，费里比利用西方神话故事中的大地女神形象与“黄泉之女神”进行类比，大大提高了日本传统文化形象的普遍性一面，张伯伦的译注中则较少运用此类跨文化比较的方式，而是突出日本传统文化特殊性的侧面。

2) “常世国”

除了黄泉地府形象，《古事记》中还塑造了仙境乐土“常世国”形象。《古事记》上卷的末尾，天神之子御毛沼命渡海去往“常世国”：御毛沼命者、跳波穗渡坐于常世國（周作人，2015 : 47）。费里比在译注中注释如下。

常世国：生命永恒之地，据说在大海的另一面，永生世界。后世将其与中国神话中的仙境圣地相混淆。日本学者松村将其称为日本文化语境下的“乐土”，而因“常世”常被后世学者误认作“常夜”（两词日语发音相同），但从文本内容来看，“常世国”并非黑暗与死亡之地，而是永生长乐之土。高天原似与“天神”体系相关，而常世国与“国神”

体系相关 (Philippi, 1968 : 610)。

张伯伦则在译注中认为：“常世国”形象在早期日本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意指某乐土或冥世。此概念似是从中国、或从佛教教义中借取，此后被模糊地借用于其它国家。《古事记》上卷中，伊邪那岐所用的桃子即从“常世国”取来，按照此推论，“常世国”应位于日本西面的朝鲜半岛。常世国也可泛指佛教乐土，甚至也可能是指中国南方、抑或琉球群岛。无论如何，“常世国”虽有其名，具体意义却不甚明了，笼统指代一片存在于远方的世外乐土。《日本书纪》中，田岛守将其形容为神灵或天使的隐居之地，凡人无法到达。本居宣长极力抨击“常世国”概念来自其它邻国，认为 TOKOYO（常世）一词源自 SOKOYORI（そこより）即泛指所有外国 (Chamberlain, 1932 : 104)。

从译注内容来看，张伯伦认为“常世国”虽然所指意义及具体地点不明，但却是古代日本文化中的原生概念，强调其独特性的一面。费里比则站在更高角度，脱离文本之外，以人文学视角解读早期日本的文化特征，将“常世国”泛化为神仙居所、永生之地，同时将“常世国”概念融入日本早期信仰体系之中，为读者建构“高天原 -- 常世国 -- 黄泉国”的多维空间形象。

3. 民族文化形象

《古事记》文本中很多内容渗透着外来文化元素（主要是中华文化）的影响，体现了日本文化发展特征中善于吸收利用外来文化的一面。张伯伦说“很难想象远古时代日本的帝王会使用这样的中国化词句表达”。两位译者也敏锐地抓住这些表达向读者展示日本早期文化信仰中的外来元素影响痕迹，例如《古事记》中所述的人类始祖伊邪那岐命与伊邪那美命因生子残疾而向天神问卜，天神回答“因女先言而不良、亦還降改言”，费里比译本在此添加脚注指出“女子先于男子发言不祥，这种观点应是源于古代中国思想，上古日本不应有这种男尊女卑意识” (Philippi, 1968 : 52)。

张译本的词源考据极其精深，使得读者感受到《古事记》文本内中华文化元素的深入浸润，他广泛涉猎了同时代日本学者对《古事记》文本的解读，如《古事记标注》、《假名古事记》、《校正古事记》、《古事记传》等同时代日本学者对日本古事的解读，同时对文献进行批判性的调查分析。费译本虽然也突出了序言的语言表述中所受的外来文化元素的影响，但基本没有深入到词源考据层面。

以《古事记》开篇为例，作者安万侣在序言中对日本天皇的颂扬之词仿效中国四字骈文，大量引用中国典故。两个译本中的翻译方式和译注解均体现出了较大差异，在此试举数例。

(1) “道轶轩后，德跨周王” (周作人, 2015 : 2)

张译本中将“轩后”和“周王”两词按照日语音读方式分别音译为“Ken-Kou”“Shiu-O”，并在译注中列出了“轩后”和“周王”的汉字的写法，并进一步解释此二人“是中国上古时代传说中的有名君王” (Chamberlain, 1932 : 9)。而费译本则将“轩后”翻译成较为直白的 Yellow Emperor“（黄帝）”，“周王”译成“King of Zhou”，并在注释中进行说明“黄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统治者，周王指古代周朝的周文王” (Philippi,

1968 : 42)。

(2) 伏惟皇帝陛下，得广光宅，通三亭育。(周作人，2015 : 3)

张译本中将“通三亭育”译为：“being versed in Triad”并在脚注中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此句出自《老子》，读者可参阅法国汉学家儒莲的《中国孤儿》，此处“通三亭育”指“贯通天、地、人三个领域……。(Chamberlain, 1932:9)”而费译本此处译为“being in communion with the Three”，与张译本较为接近，脚注部分解释则较为简单：“即指天、地、人”(Philippi, 1968 : 42)。

(3) 连柯并穗之瑞，史不绝书，列烽重译之贡，府无空月。可谓名高文命，德冠天乙矣。(周作人，2015 : 3)

张译本中对“文命”和“天乙”直接以日语音标音译为“Bum-Mei”和“Ten-Itsui”，并在脚注中进行说明：此句仿自中国古籍《昭明文选》，“文命”为禹帝的原名，“天乙”则为中国古代帝王汤的本名，相传汤于公元前18世纪建立商朝(Chamberlain, 1932 : 10)。而费译本则将这两个词意译为“Emperor Yu”^①和“Emperor Tang”^②，分别做两条脚注：①“远古传说中的帝王，创立了夏朝(公元前2205年)”②“商朝(公元前1766年)的创立者”(Philippi, 1968 : 43)。

可以看到，两个译本的译注都非常注重《古事记》文本中的外来文化要素影响，却使用了不同的方式。张译本主要使用“音译+脚注”，而费译本则多用“意译+脚注”的形式。费里比在正文中采用具有归化特征的意译方式，直接译出词句的内涵意义，便于西方读者理解，且避免将涉及中华文化要素的背景知识在正文中展开解说，以免打扰读者阅读节奏，而是在译注中进行进一步论述，这样所造成的阅读负担相对较小，易为读者所接受，但所建立的文化形象则相对缺少文献的考据和训诂，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历史脉络所蕴含的丰富维度。

相比之下，张译本在译文中对异国文化元素多使用音译，“异化”翻译痕迹更为明显，为读者创造一定陌生的距离感，然后以脚注释义弥合这种距离。《老子》、《文选》等中国古代典籍的考据使得张伯伦的译注释义翔实充分，既联系上下文语境对涉及古代中华文化要素的词句作了具体的分析，也介绍了这些词句的来源出处。此外，张伯伦对《古事记》文本中的很多词句进行了详尽的溯源考据，使得原文文本中来自异国的文化元素得以进一步凸显，展现了日本对外部文化吸收的深度与广度，引导读者看到文本中所引用中华典籍元素的丰富多样，令人信服地建立起了“善于深入吸收借鉴他国文化成果”的日本文化形象。

应该说，费里比在这方面的译注无论在条目数量和深度上都远不及张伯伦。但张伯伦的这种翻译方式无疑带给读者的阅读负担较大，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费里比的译文流畅而简洁，对比之下张伯伦译文略显生涩臃肿(Robert S. Ellwood, 1969 : 357 ; Randy Huntsberry, 1969 : 301~302)。

4. 君王形象

《古事记》是在明显的政治意图下，利用原有的天皇家传承的祖先系谱及其他古代氏

族的祖先传说及神话故事为素材编写而成的,用以树立天皇超然而高贵的正统天神后裔形象,而其他氏族则不过是出于天皇家祖先神的旁支。这一点在《古事记》序文中也有清楚表露,经“壬申之乱”而即位的天武天皇担心诸家所传“帝纪”(记载历代天皇的历史记录)以及“本辞”(神话与传说)“既违正实,多加虚伪”,于是对以往帝纪与本辞予以修订,去伪存真,以流传于后世。《古事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也就是说,《古事记》的编撰目的在于统合当时日本各氏族的历史观。因此,《古事记》文本与日本天皇的谱系密切相关,在《古事记》上、中、下三卷中,“天皇”事迹相关的叙述占到60%以上,构成了文本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伯伦和费里比的英译本中均以各自的译注对“天皇”这一形象进行了深入诠释。

首先是对“天皇”称谓的翻译。“天皇”是日本君主的独特称谓,现有研究表明,“天皇”一词的词源受到了中国道教思想的影响。东大教授福永光司考证“天皇”一词应来自道教文献《枕中书》(葛洪著)的“天皇地皇人皇”词条,得到学界广泛接受。关于日本君主的“天皇”尊号产生过程,我国学者也进行过研究,推断可能是唐宪宗元和年间日本国王推行唐代礼制,引入了这一称谓,或是在五代时期之后取法于辽国(乙三,1995:93)。

“天皇”一词也与日本特有的民族主义认知相关,日本学界长期将“天皇”视为日本神道教的产物,这一点在张译本的译注中也可以看到。张伯伦将《古事记》中“天皇”一词译为“*Heavenly Sovereign*”,区别于西方普遍接受的君王概念,建立起君权与神权合一的统治者形象。在译注中,张伯伦解释道:日本学者们极力主张“天皇”称谓在日本文化中具有极其深厚的意义,不应简译。他们认为,这一称谓并非借自中国,而是日本所独有的(Chamberlain, 1932: 140)。张译本在此处将本土视角融入译注中,实现对异质文化形象的他者化处理。

而费里比在译注中阐明了译者对《古事记》文本写作意图的理解:《古事记》中实际糅合了多条叙事线索和传统故事,以便在国家神话体系中平衡大和统治集团和其它从属集团的地位和利益。这种政治神话需服从中央统治者和地方贵族的利益(Philippi, 1968: 8)。在费里比看来,这种“中央政权+地方自治”的统治格局与西方君主制政体构造并无太大差别,因此他直接将“天皇”归化翻译成“*Emperor*”,在西方读者看来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君主形象,便于西方读者理解,着重于突出日本文化中普遍性的一面。

此外,两个英译本中通过译注对《古事记》中天皇行为进行深度解读,这也构成了西方读者眼中天皇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古事记》下卷“雄略天皇”卷中描写雄略天皇面对献舞的少女抚琴应和,并吟诵和歌:坐吴床上的神亲手弹奏琴(周作人, 2015: 219)。

对于此处描述的天皇行为,张译本的译注从“神灵”与天皇之间的继承性着手,“(此处)天皇自称神灵,日本的‘国学’学者橘守部极为欣赏此节”。译注中这样的描述拉近了天皇与“神灵”之间的距离,建立皇室血脉的神化形象。

费译本则仍然延续了以人类学角度将《古事记》中的宗教行为解释成一种萨满巫术类型的原始信仰的倾向。此处他在脚注中解释道“... 古代日本的萨满仪式有使用瑶琴伴

奏的传统，很有可能古代日本人认为此处是雄略天皇在恍惚间被神灵附身，并弹奏乐曲”（Philippi, 1968 : 357）。这种基于人类文化学角度的叙述也强化了天皇的普遍性形象。

5. 结语

神话历史人物、神话典故和神话风物在异语文化语境中传承，需要借助注释对这类文化元素进行深度阐释。从这个意义来说，《古事记》两种英译本中数量众多的注释极大丰富了西方读者视野中的早期日本社会文化形象。张伯伦译本和费里比译本中所建立的原始宗教形象、异域世界形象、民族文化形象及君王形象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从中可以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学术思想、文化身份、文化自觉性的异同。笔者认为，两个译本至少在三个维度上体现出了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的关联性。

首先，从文化特征的角度看，张伯伦的英译本中展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注解，显示出他心系日本文化传统，看重日本原生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把日本文化视为区别于西方文化类型的“他者”，他的翻译尽量向原文靠拢，译注也以展现文化差异性为主。但是这种异化翻译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注释可以让西方读者了解和欣赏日本特有的文化精髓，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他仅仅将日本文化外化成“另类”的倾向，掩盖了日本文化中普遍性的一面。而费里比译本的译注中则融入了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现代人文知识，为西方读者补充了对《古事记》文本进行现代性解读的背景条件，他的译注更多从“同化”方向对《古事记》文本进行解读，努力展现古代日本文化中所蕴含的普遍性元素。

其次，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来看，张伯伦秉承的是一种向内的文化形象建构，努力将文本置于日本文化背景中进行解读，维护日本文化的原生性。费里比则属于外向性文化建构，将西方社会学知识吸收入文本积极进行文化重构。

此外，从阐释风格来看，张伯伦基于全面丰富的资料钩沉，通过精深的训诂考据将日本学者对《古事记》的文本阐释介绍给读者，很少同西方文化中的类似形象作比较。而费译本则以西方文化形象做类比，敏锐地洞察了东西文化的互文性，以此作为形象话语会通的方式，注重异文化对比，折射了跨文化的阐释意识和跨学科的阐释维度，使日本文化的形象话语更为细致地融入西方语境。

两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国家的译者从以上三个维度建构起了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古代日本文化形象，这两种形象相互交叠，共同组成了一幅古代日本文化形象的立体画卷。

参考文献

- [1] Donald L. Philippi (Translator), *Kojiki*[M].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68.
- [2] Basil Chamberlain (Translator), *The Kojiki, Translation*[M].Kobe:J.L.Thompson&Co.,1932.
- [3] 乙三. 试述我国古代帝王称号兼及日本天皇名称的来源 [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 01 期.
- [4] Paolo Villani, Reviewed Work: *The Kojiki: An Account of Ancient Matters* by Heldt Gustav.*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Vol. 43, No. 2 (2016).
- [5] RobertS. Ellwood, Reviewed Work: *Kojiki* by Donald L. Philippi.*History of Religions*, Vol. 8, No. 4 (May, 1969).

- [6] Randy Huntsberry. Kojiki by Donald L. Philipp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9 (1969).
- [7] 周作人（译）. 《古事记》[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8] 李广志. 论日本原始信仰中巫女的主体地位 [J]. 《民俗研究》, 2010 年第 1 期.
- [9] アンダソヴァ・マラル. 古事記における「出雲」とシャーマニズム —— ホムチワケの出雲訪問の考察を通して [J]. 『日本文学』第 61 卷第 2 号、2010.
- [10] 鎌田東二. 平和と神道の問題性と宗教の未来 [J]. Journal on public affairs, 13 (1), 197-210, 2017.

『ノルウェイの森』の中国語翻訳ストラテジー比較研究

張秀閣

北京科技大学

一、序論

村上春樹の『ノルウェイの森』は中国語に訳され、多く読まれてきた。その中で、林少華と頼明珠の翻訳はそれぞれ中国大陆や台湾地域など中国語圏でよく読まれ、評価されている。林少華と頼明珠との翻訳が大きく異なる点も注目を浴びており、双方のよしあしについて世間でも大いに議論された。

翻訳行為理論が提示する研究視点から、林訳本と頼訳本のそれぞれの翻訳プロセスを考察し、様々な参与者の役割と翻訳関連事情（時間、場所、媒体）を簡単にまとめると、以下ようになる。

訳者の林少華は1988年12月に当時中国の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長の李徳純の推薦で『ノルウェイの森』の翻訳を担当した。それまで、林少華は村上春樹の作品に触れたことはなかった。林少華が推されたのは氏の中国語が美しいという理由であった。林訳本は、最初1989年7月に漓江出版社から刊行された。その後2001年に上海訳文出版社が『ノルウェイの森』の中国語簡体字版の版權を取得したため、漓江出版社の訳本で削除された性的描写が編集者沈維藩などの主張（林少華は最初それに同意しなかったが、仕方なく承諾したという）によって補充された。先の翻訳における誤訳（主に欧米文化に関する外来語、例えばバンドや曲の名前など）も熱心な読者の協力で訂正された。2007年に出版された訳本でも、再び欧米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について当時定着していた中国語訳名にするという訂正が行われた¹⁾。本研究ではこの2007年に出版された訳本を取り上げ、以下林訳本と略称する。

1980年代の初めごろ、頼明珠は既に村上春樹のほかの作品を一部訳しており、村上春樹作品の中国語翻訳の第一人者であったと言える。頼明珠は自分が村上春樹の作品を読んで好きになったので、それらを翻訳したという。初期に頼明珠の翻訳はあまり注目を浴びていなかった。1989年『ノルウェイの森』が台湾故郷出版社から出版され、村上春樹ブームが起きたことがきっかけとなり、頼明珠は村上春樹の小説を多く翻訳し始めた。最初の『ノルウェイの森』がオープン過ぎたことによる青少年への悪影響を心配した頼氏はその後翻訳をせず、その間出版社からの翻訳の依頼もなかった。その後、故郷出版社の『ノルウェイの森』の訳本は版權の問題で販売禁止になり、台湾時報出版会社が中国語繁体字版の版權を取得した。そして、頼氏に翻訳を依頼し、一部の読者も頼明珠の翻訳を期待したので、頼氏は訳本に違いがあるのも面白いと考え、『ノルウェイの森』を翻訳した²⁾。頼訳本は1997年6月に出版されたが、誤訳も多くあった。2003年に新たな訳本が出版されたが、1997年版とは風格が一変しているため、

本研究の考察対象から外す。2003年版の訳本についての詳細は張明敏（2009）を参照されたい。

本論文は話題を呼んだ林訳本と頼訳本を取り上げ、機能主義翻訳理論を用いて両訳本の翻訳ストラテジーを幾つかの角度から比較し、訳者が意識的また無意識的に採った翻訳の手法の背景や原因を研究し、その効果のよしあしを検討したい。本論における翻訳ストラテジーとは広義の意味で使用しており、全体的ストラテジーと局所的ストラテジーに分けて分析を展開する。

二、訳本の全体的ストラテジーについて

スコポス理論の示唆により、訳者の全体的ストラテジーについて、訳者自身の説明や他者の考察によって訳者それぞれの原作に対する全体的な把握をまとめてみた。注目したのは訳者による『ノルウェイの森』に対する全体的な把握、作品全体のスタイルを表す言葉遣いと注釈のつけ方である。

1. 訳者による『ノルウェイの森』に対する全体的な把握について

『ノルウェイの森』の言葉は簡潔で流暢で、ユーモアがある。外来語が頻出し、文体には英文調或いは翻訳調（異質性）があると指摘できる。訳者自身の説明から原作に対する全体的な把握が多少窺える。林少華は文学作品の翻訳は必ず「翻訳文学」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主張し、作品の「味」を伝えるべきだと言った。林氏は文学翻訳には必ず訳者の個性が出てくると考えている。錢鐘書の「化境」説に共鳴するという³⁾。頼明珠は訳者が透明人間のように原作の元々の特徴を伝えようと努力する必要があると主張している。訳者は翻訳を内容でも形式でも原作と一致させ、訳者の個性をできるだけ控えるべきであるという主張である。訳者は無色無味の水のようで、できるだけ原作の味を伝える存在だと考えている⁴⁾。訳者二人は共に原作の味或いは特徴を伝えることを重視しているが、考え方と訳し方が大きく違っているのは明らかである。

林少華は、訳本の対象読者を中国語読者（主に大陸の読者）にし、翻訳作業を1988年12月から開始した（訳本は1989年7月に出版された）。訳者は翻訳の文学性を重視し、「審美的忠実さ」を主張している。頼明珠は『ノルウェイの森』が村上春樹の特徴を有する作品だと考え、できるだけ忠実に原作を再現することを翻訳の目標とした。頼氏は台湾の読者を潜在的に対象読者にしたと推測できる。頼氏は1994年に翻訳を始め、「信」を第一にし、逐字訳の形で翻訳した。

2. 訳本の言葉遣いについて

前述したように原作には外来語が多くある。林少華は作品に出てくる欧米文化に関する多くの曲やバンドの名前を翻訳するのに一番苦しんだと言っている。初版での誤訳は読者の協力で訂正された。林訳本では、外来語は主に既に中国語に定着した訳語、或いは音訳によって翻訳されている。頼明珠も外来語の翻訳で頭が痛くなると言って

いる。頼訳本の訳し方は外来語の語源に還元する方法である。頼明珠は中国語に英語を入れ、漢字の文章に形の違う英語を入れることで文章がもっと美しく見えるのだと主張した⁵⁾。

林訳本で四字熟語（成語）が多用されているのは周知のことである。これについて、林少華は自分の語彙や文学的素養と関係があると説明しており⁶⁾、四字熟語の多用が林訳本の一つの特徴だとい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一方、頼明珠は作品原文の文体的特徴を保つために四字熟語を使わないと説明しているが、実際に頼訳本を読んでも、四字熟語が一切な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く、ただ林訳本ほどは多く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わかった。

四字熟語は中国語の中で古くから慣用的に用いられるひとまとまりの言葉で、翻訳に四字熟語を使うべきか否かについて対立的な意見があるが、筆者は孫立春（2008）が主張した、四字熟語は有効的表現であるため翻訳に使うかどうかはケースバイケースだという意見に賛成する。それと同時に、四字熟語は非常に洗練された言葉であるが、時代によって意味が変わっている場合があるので翻訳での使用の際には十分な注意が必要である、という鮑川運の指摘も留意したい。

3. 訳文の注釈について

林訳本と頼訳本はどちらにも注釈が付されている。林訳本には脚注の形で、頼訳本には言葉の後ろに括弧を付ける形で注釈が付された。筆者が調べたところ、林訳本には注釈が 20 箇所ある。その内、4 箇所は訳注で、原作の英語を中国語に訳したものである。他の 16 箇所の注釈は固有名詞に対する解釈で、それぞれ西洋の人名、ブランドについての説明や日本特有の物事に関する解釈である。その中には「懷石料理」「すし」についての注釈もある。頼訳本には注釈が 55 箇所あり、ほぼ外来語に対する注釈である。その中の多くは西洋の人名、ブランドなどの外来語の語源を提示するもので、他は外来語の意味を解釈するものである。例えば、訳語の「咖啡欧蕾」には「(Café au lait 鮮奶和咖啡各半的大杯法式早餐咖啡)」が付されており、外来語であるカフェオレの語源に当たるフランス語と中国語の解釈が添えられている。

頼訳本の注釈が林訳本より多い原因は、頼訳本では西洋の人名や曲名について、語源が注釈の形で付されていることによる。二つの訳本の注釈における共通点は欧米の作家、歌手などの固有名詞に対して注釈が付されることであるが、相違点は二つある。一つは日本文化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に対して、林訳本には注釈が数個あるが、頼訳本にはないことである。もう一つは原作に出てくる英語についての対応方法が違うことである。林訳本ではそれを注釈で中国語に訳したが、頼訳本では原作の英語をそのまま表記しているため、注釈などはない。

これは訳者が定めた対象読者の文化的背景と関連していると推測できる。林訳本では大陸の読者を対象読者としている。彼らの一部は日本についてよく知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し、英語もあまりわからないと考えたのであろう。頼訳本では台湾の読者を

対象読者としている。彼らは日本に一定の知識を持っていて、また英語もある程度できると考えたのであろう。文学作品の翻訳に注釈を付すべきかどうかについて対立的な意見があるが、林訳本と頼訳本は共に注釈という方法で読者に異文化に関する知識を伝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

要するに、全体的ストラテジーの観点から見て、訳者は二人とも翻訳の目標や訳本の位置づけについての考え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った。

三、訳本の局所的ストラテジーについて

次に、局所的ストラテジーに関して詳しく検討する。研究するにあたり、主に統計データに基づき分類考察を行った。分類基準は藤濤文子（2007）におけるケーススタディで取り上げられた幾つかの要素（固有名詞、文化関連語彙）を参考にし、『ノルウェイの森』の特徴も考慮して定めたものである。題目・目次、固有名詞、文化関連語彙（伝統・慣習、社会・制度、衣食住、度量衡単位）などを取り上げて分析を行った。これらの要素に関する翻訳を分析することで訳者が明確に言及したもの以外にも、訳文に現れた訳者の潜意識的或いは無意識的な翻訳の癖や好みが見えたと考えられ、局所的ストラテジーがどうなっているか窺える。分析に際して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の対訳コーパスに収集された『ノルウェイの森』の原作と林少華の訳本を手がかりにして、手元にある林訳本と頼訳本を利用してデータを作成した。

1. 題目・目次について

題目と目次について、林訳本と頼訳本はどちらも原作に従っている。言及しておきたいのは、以前漓江出版社から出版された訳本には、人目を引くために編集者によって目次様のものが付されたという点である。

2. 固有名詞の翻訳について

機能主義翻訳理論によると、原作にある固有名詞は物語の場所の文化を表すものであるなら、そのような固有名詞は機能翻訳の一つの集合体となる。したがって、『ノルウェイの森』の中の人名と地名の翻訳は研究対象に値すると思われる。

地名の翻訳において、二つの訳本はほぼ原文に従っているために異同はないが、人名の翻訳は興味深い。原作における人名の表記には特徴がある。同じ名前であるのに片仮名で表記されたり、漢字で表記されたりしているのだ。例えば、重要な登場人物の一人である小林緑の名前は「ミドリ」と書かれたり、「緑」と書かれたりしている。原作において漢字の「緑」は360回、片仮名の「ミドリ」は18回であるが、ルールがないように見える。もう一人の登場人物の石田玲子の名前も漢字とカタカナで書かれている。漢字の表記はただ3箇所だけ「石田玲子」とあり、いずれも署名である。そのほかはすべて片仮名で「レイコ」と書かれている。両訳本による人名の訳し方について調べた結果は以下の表である。

表 3-1 人名の訳し方について

原文	ワタナベ	直子	緑・ミドリ	キズキ	レイコ	ハツミ	永沢
林訳本	渡辺	直子	緑子・緑子	木月	玲子	初美	永澤
頼訳本	渡邊	直子	緑・midori	Kizuki	玲子	初美	永澤

表 3-1 からわかるように、林訳本では人名はすべて漢字で訳されている。そして、「緑・ミドリ」が区別されることなく「緑子」と訳されている。「緑子」という訳名もまた興味深く、日本女性の名前は「～子」という形が多いと判断した結果であろう。これについて、藤井省三（2007：204）は「「子」を加えて日本人らしさを演出している」⁷⁾と評している。

頼訳本では、原作での片仮名表記の名前をローマ字で表記することで、漢字表記の名前と区別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が、一貫性がない。片仮名の「ミドリ」「キズキ」はローマ字を使用して「Midori」「Kizuki」と訳されたが、同じ片仮名表記の「ワタナベ」「レイコ」「ハツミ」は「渡邊」「玲子」「初美」と漢字に訳されている。つまり、頼訳本では原作の書き方に対応しようという努力が見えるが、翻訳方法が一貫していないために翻訳ストラテジーが混乱しているようである。さらに、原作の「ミドリ」「キズキ」は片仮名でも日本語であるため、原作の使用言語と一致しているが、中国語訳本におけるローマ字の「Midori」「Kizuki」表記が、原文と同等の機能が果たせるかどうかについて疑問がある。

林訳本と頼訳本の中の人名に対する翻訳について、藤井省三（2007：206）は「林少華は片仮名の名前をためらうことなく漢字に直してしまうことにより、『森』の登場人物にたいするより深い解釈の可能性を閉ざしてしまっ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か」と批判し、「これに対し頼明珠は原作者の微妙な意図に対し慎重な配慮を示しているといえよう」と評価した。藤井省三（2007）による林訳本への批判は確かに一理あるが、頼訳本への評価が高すぎ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

また、村上春樹の作品、特に『ノルウェイの森』の中国での受容には、ある特別な現象が見られる。読者の多くは登場人物を真似し、その中に出てくる本を読んだり、音楽を聞いたりするのだ。このような人々にとって、『ノルウェイの森』は文化ガイドブックのよう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だからこそ、読者は固有名詞の翻訳により高い期待や要求を持ち、それらの本や音楽をより容易に探し出すために、訳者に固有名詞を慎重に正しく訳してほしいのであろう。『ノルウェイの森』に出て来る作家や作品などの固有名詞に対して、林訳本（訂正後）も頼訳本も忠実に伝えようと努力している。欧米文化に関わる固有名詞について、頼訳本はそれらの外来語の語源を提示する方法で、読者にとって便利な手がかりを与えた。例えば、原作に出てくる『ライ麦畑』と『性の人間』という本は、林訳本では『麦田里的守望者』と『性的人』と訳し、頼訳本では『麦

田捕手』と『性的人間』と訳して、いずれも大陸と台湾で出版された中国語訳の書名に一致させている。これは林訳本も頼訳本も読者の要望に応じようとする努力の結果だといえよう。

3. 人代名詞や呼称の翻訳について

日本語と中国語における呼称は大きく異なる。翻訳する時にどう訳すかはけっして簡単な問題ではない。

例えば、原作に永沢という人物の名前が「永沢」「永沢君」「永沢さん」の三つの形式で合計 128 回出てくる。「永沢」は表 3-2 にまとめたように 4 箇所である。

表 3-2「永沢」の翻訳比較

行数 ⁸⁾	原文	林訳本	頼訳本
298	彼は永沢という名の東大の法学部の学生で、僕より学年がふたつ上だった。	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年级。(P40)	他是名叫永澤的東京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學年比我高兩年。(P43)
301	永沢という男はくわしく知るようになればなるほど奇妙な男だった。	永泽这个人，对他了解得越多，越发觉此君古怪。(P40)	永澤這個人，是你越瞭解他就會越覺得奇怪的人。(P43)
313	永沢という人間の中にはごく自然に人をひきつけ従わせる何かが生まれつき備わっているようだった。	永泽这人身上，似乎具有天生的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P42)	永澤這個人身上似乎天生具備了自然能夠吸引人跟隨他順從他的什麼似的。(P45)
2513	「せっかく来たんだからデザートも食べていけば」と永沢が言った。	“好容易来一趟，点心还没吃咧！”永泽说。(P271)	“難得來了總要吃完甜點”永澤兄說。(P272)

「永沢」の 4 箇所の内、「永沢という名」は名前の説明で、両訳本でどちらもそのまま「永泽」としている。「永沢という」の 2 箇所も同様に「永泽」としている。最後の例は、林訳本では「永泽」とし、頼訳本では「永泽兄」としている。

「永沢君」は 3 箇所、表 3-3 にまとめたように、全部彼女ハツミの話の中である。林訳本では全て「永泽」で、頼訳本では全て「永泽君」だが、中国語の感覚によって判断すると、「永泽」は「永泽君」より、恋人同士の間での呼び方としてふさわしいのではないと思われる。

表 3-3 「永沢君」の翻訳比較

行数	原文	林訳本	頼訳本
2523	「永沢君、あなたは私にもべつに理解されなかったっ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の？」とハツミさんが訊いた。	“永泽，你认为不被我理解也可以？”初美问。(P272)	“永澤君，你認為不被我瞭解也沒關係嗎？”初美姐問。(P273)
2598	「ねえワタナベ君はどう思ってるの？私と永沢君のことを？」	“渡边君，你是怎么看的，我和永泽的关系？”(P278)	“嘿，渡邊君你覺得怎麼樣？我和永澤君的事？”(P279)
2614	「そういうのってたぶん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ことなのよ。自分では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ことなのよ。永沢君に言わせれば、そんなこと君の責任だ。俺は知らんって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けれどね」	“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自己也不知所以然。要是让永泽来说，恐怕就成了我的责任，与他毫不相干。”(P280)	“這種事情大概一點辦法也沒有吧。由不得自己啲。要是讓永澤君來說的話，他會說那是你的責任。這終究跟我沒關係吧”(P281)

残りの 121 箇所は全て「永沢さん」である。林訳本では 5 箇所は「永泽君」とし、その他は全て「永泽」としている。頼訳本では「永沢さん」は全て「永沢兄」としている。まとめると表 3-4 のようになる。

表 3-4 「永沢」に関する翻訳比較

原文	永沢（4 箇所）	永沢君（3 箇所）	永沢さん（121 箇所）
林訳本	永泽（4 箇所）	永泽（3 箇所）	永泽（116 箇所） 永泽君（5 箇所）
頼訳本	永澤（3 箇所） 永澤兄（1 箇所）	永澤君（3 箇所）	永澤兄（121 箇所）

林訳本では「永沢」「永沢君」「永沢さん」がほぼ（128 箇所の中 123 箇所）「永泽」と訳され、中国語コンテキストにおける表現の習慣に従っているが、区別がつけられていない。頼訳本ではそれぞれ「永澤」「永澤君」「永澤兄」としているが、この三つの訳語の中国語コンテキストにおける意味は原作とずれがある。

また両訳本における「レイコさん」の訳し方についても、先行研究の藤井省三（2007）を検討しながら考察した。「レイコさん」について、頼訳本ではほとんど「玲子姐」と訳し、「玲子」としたところもあるが、林訳本ではすべて「玲子」と訳している。翻訳の相違

について、藤井省三（2007）は、林訳本の訳し方は中国語の習慣に従ったものだと推測した。即ち「中国語では友人など親しい同士のあいだでは「さん」や「君」に相当する敬称を省略するのが普通である」からだ。頼訳本の「玲子姐」という訳し方について、「頼明珠は「玲子姉」と同世代の親戚で年上の女性に対する敬称である「姉（姐）」を使うなど、日本語の「さん」の感覚を伝えようと、細やかな配慮をしている点は興味深い」と藤井省三（2007:203）は評価したが、中国語の訳文の中で、果たして「兄」や「姐」で日本語の「さん」の意味を伝え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かどうか、筆者は疑問を抱いている。林訳本では「さん」はほぼ訳されず、原作に「さん」が出たり出なかったりする違いを伝えられない点も問題になると思われる。

考察の結果、両訳本における訳者は呼称を翻訳する時、ある程度の考慮をしたようだが、任意によるところも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つまり、その点について翻訳ストラテジーは徹底されていないといえよう。

4. 文化関連語彙の翻訳について

先の2.において注釈を考察した際、文化関連語彙の翻訳にも触れたが、ここで伝統・習慣、社会・制度、衣食住や度量衡単位などに関する語彙の翻訳を考察する。『ノルウェイの森』には日本伝統文化の要素はそれほど多くはないが、西洋文化の要素が多いという事情を考慮し、ここでは日本文化と西洋文化の両方の要素（中国人にとっていずれも異文化要素である）を考察対象としたい。

日本の地名の翻訳において、林訳本では「西京」に「即日本京都」（即ち日本の京都、筆者注）という注釈が付けられただけであり、頼訳本では日本の地名に関する注釈はほぼない。

衣食住に関する語彙の翻訳について、日本料理と欧米料理を例として考察を行った。日本料理について、林訳本には注釈の形で懐石料理と寿司についての説明があるが、頼訳本には日本料理に関する解釈や説明がない。訳本の出版時、それぞれの対象読者が違うと推測したが、更に、大陸と台湾地域の人々の日本料理に関する知識にも差があったと推測できよう。

度量衡単位について、原作に出てくる「円」は林訳本では「元」と訳しているが、頼訳本では「圓」と訳している。訳本では金額はそのまま、ただ単位が「円」から「元」や「圓」になっている。両替の面から考えると、間違いといえるため誤解を招きやすい。

以上をまとめると、訳者が文化的な要素を翻訳する時、ケースバイケースであり任意的だといえよう。やはり翻訳ストラテジーが徹底しているとは言えない。

四 結論

本論文は話題になっている『ノルウェイの森』の林訳本と頼訳本を取り上げ、全体的ストラテジー、題目・目次、固有名詞、文化関連語彙などの翻訳の局所的ストラテジーを検討した。具体的な分析を通して、両訳本は一部の評論で言われているように

極端ではないことがわかり、細部の考察を通じて訳本の全体像もはっきりと捉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そして、両訳本は全体的ストラテジーがあるが、細部において綿密な翻訳ストラテジーに欠けているところがあるとわかった。

注

- 1) 筆者の質問メールに対する編集者沈維藩の返事による。
- 2) 張明敏・台湾人の村上春樹——「文化翻訳」としての村上春樹現象・藤井省三編・2009. 東アジアが読む村上春樹—東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国際共同研究(MURAKAMI Haruki STUDY BOOKS). 若草書房
- 3) 翻译:“担水上山”. 林少华.2010. 乡愁与良知: 林少华散文百篇. 青岛出版社、241-243
- 4) 2008 年第 19 回香港書展での講演による。
- 5) 赖明珠.2009. 这个字村上春树会不会用? 明日风尚 2009/05
- 6) 林少华.2006. 落花之美,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 7) 藤井省三.2007. 村上春樹のなかの中国. 東京・朝日新聞社
- 8) この行数は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対訳コーパスに付されたものによる。以下の表も同様である。

出典

- [1] 村上春樹.1987. ノルウェイの森. 講談社
- [2] 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译.2007. 挪威的森林. 上海译文出版社
- [3] 村上春樹著・赖明珠译.1997. 挪威的森林. 时报文化出版
- [4] 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対訳コーパス『ノルウェイの森』原文と林少華の翻訳

参考文献

- [1] Christiane Nord; 张美芳, 王克非主译.2005. 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2] 柴田元幸, 藤井省三, 沼野充義, 四方田犬彦編.2009. 世界は村上春樹をどう読むか. 文藝春秋
- [3] 村上春樹・柴田元幸.2000. 翻訳夜話. 文藝春秋
- [4] 村上春樹・柴田元幸.2003. 翻訳夜話2 サリンジャー戦記. 文藝春秋
- [5] 林少华.2005. 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 宁夏人民出版社
- [6] 林少华.2010. 乡愁与良知: 林少华散文百篇. 青岛出版社,
- [7] 林少华.2006. 落花之美. 中国工人出版社
- [8] 藤井省三.2007. 村上春樹のなかの中国. 東京・朝日新聞社
- [9] 藤濤文子.2007. 翻訳行為と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機能主義的翻訳理論の諸相. 松籟社
- [10] 张明敏.2009. 村上春树文学在台湾的翻译与文化. 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 [11] 藤井省三編.2009/06b. 東アジアが読む村上春樹—東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国際共同研究. 若草書房
- [12] 孙立春.2008. 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 [13] 赖明珠.2009a. 这个字村上春树会不会用?. 明日风尚. 第5期
- [14] 赖明珠.2009b. 横看竖看村上春树的“1Q84”. 明日风尚. 第12期
- [15] 林少华.1998.“和臭”要不得——村上春树文集翻译随笔. 出版广角. 第1期
- [16] 林少华.2008. 村上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以语言或文体为中心. 外国文学. 第4期
- [17] 林少华.2009. 文体的翻译和翻译的文体. 日语学习与研究. 第1期
- [18] 林璋.2009. 文本的翻译与评说——以林少华译《挪威的森林》为例. 日语学习与研究. 第5期
- [19] 孫軍悦.2004. <誤訳>のなかの真理——中国における『ノルウェーの森』の翻訳と受容

- , 日本近代文学. 第 71 集: 141 ~ 156
- [20] 孫軍悦. 2006. 翻訳研究理論に関する一考察 —— 中国語『ノルウェーの森』の分析を通して ——, 言語情報科学. 第 4 号: 193 ~ 209
- [21] 孫軍悦. 2007. 中国大陸における『ノルウェーの森』の受容 —— 出版過程を中心に ——, 日本研究. 第 8 号: 121 ~ 143
- [22] 藤井省三. 2009a. 村上春樹の中国語訳 —— 日本文化の土着化と中国本土文化の変革. 日语学习与研究. 第 1 期
- [23] 王成. 2009. 翻译的文体与政治 —— “林译” 文体论争之刍议. 日语学习与研究. 第 1 期
- [24] 王东风. 2001. 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 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中国翻译. 第 5 期
- [25] 王志松. 2009. 翻译、解读与文化的越境 —— 也谈“林译”村上文学. 日语学习与研究. 第 5 期
- [26] 杨炳菁. 2009. 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 —— 林译村上文本在中国大陆. 日语学习与研究. 第 5 期
- [27] 杨炳菁. 2010. 论村上春树的翻译. 日语学习与研究. 第 2 期

多译本比较视角下日语拟声拟态词翻译的主观性识解

熊磊

江西师范大学

刘臻胜

江西服装学院

1 引言

日语中的拟声词、拟态词非常丰富,在日常口语以及文学、动漫、戏剧等作品中使用频率很高,这是其他语言难以比拟的。日本国内的《拟音語·擬態語辞典》中收录的数量约为1500个。基于日语的发音以及构词的特点,拟声词、拟态词的创造性很强,基于同一词干同时也能派生出很多词。相比之下汉语的象声词(拟声词)远不及日语发达,而拟态词的概念尚无(陈岩,2009),但这类词往往归入情状副词。再加上日语拟声词、拟态词的含义还与其发音、结构有一定联系,这就往往导致了日汉翻译时的不对应,如何处理好拟声词、拟态词,这是译者需要斟酌的关键问题。

关于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翻译研究在汉日译学界内一直备受关注,在中国知网(CNKI)上收录论文近100篇,从功能对等、归化异化、美学等视角,对中日两国文学作品的译本、广告用语、儿童绘本以及个别常用词汇中出现的拟声拟态词的翻译方法进行分析归纳(如高宁1995、杜海怀2003、张秀华2001、渠培娥和陈燕生2014等),其中与《伊豆的舞女》译本相关论文有3篇(秦昕2014、耿鑫2018、李红梅2018)。综观各类研究,已经对相当数量的拟声拟态实例进行了较细致的考察,在双语文本中从语义角度分析一词多义现象,或是讨论日语可转换的汉语词汇的词类问题,已经能够把握到大致的拟声拟态词的翻译方法及特点,但缺乏对翻译主体(译者)的关注。译者既是读者也是作者,翻译过程充分体现了译者的认知方式,本文转向翻译主体的认知考察,有利于我们把握译者在译作中的创造性的发展趋势。

拟声拟态是用文字符号对人以及其它有生命或无生命体的摹拟。既然是摹拟,就属于相似认知的范畴。拟声拟态能反映出人类认知的心理基础,在人类共同的认知模式上,翻译这种跨文化的过程中同样表现出某些相似性。王寅(2005)提出了翻译的“两个世界”之观点,“我们所谈论的一切无非是关于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它们是语篇生成的基础,语言中的词句也都反映了这两个世界。那么读者也须依靠自己的理解将语篇信息尽量还原为这两个世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应当充分考虑译出原作所欲表达的这两个世界”“原文作者与译者和读者的认知世界必定是既有同也有异,这就决定了不同语言的文本之间具有互译性,也决定了有些信息是不可译的,同时还决定了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2 译本及研究方法

《伊豆の踊子》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代表作和成名作。作品篇幅不长，共计 2 万余字符，其中运用了大量的拟声词拟态词，共有拟声拟态词 54 个，其中拟声词 12 个，拟态词 37 个（有些为重复使用）。作者通过对人物及各类情状描写给读者留下生动、细腻的印象。这也是本文选取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其二是因为该作品是川端康成所有作品中汉译版本数量最多的，截止 2020 年的数据，译者近十人译本有 30 版次。参照孙文慧（2016）的数据和笔者后期收集，各译本如表 1 所示¹⁾。

表 1《伊豆の踊子》汉译版（1981-2020）

序号	译者	译本出版时间（出版社）
1	韩侍桁	1981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	叶渭渠	198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北京出版社） 2005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南海出版公司）
3	刘华亭	1995 年（星光出版社，台湾）
4	李德纯、刘振瀛	2000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5	艾莲	200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 年（浙江文艺出版社）
6	叶渭渠、唐月梅	2006 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 年（南海出版公司） 2014 年（南海出版公司） 2020 年（南海出版公司）
7	李德纯等	2004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8	高慧勤	2005 年（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9	林少华	2011 年（青岛出版社） 2012 年（青岛出版社） 2014 年（青岛出版社）
10	津文	2016 年（团结出版社）

从该统计表可以看出,就《伊豆の踊子》汉译本而言,大陆地区共出版过以下几个版本:韩侍桁译本;叶渭渠译本;叶渭渠、唐月梅合译本、高慧勤译本(包含其以笔名“艾莲”出版的译本)、李德纯译本及林少华译本、津文译本等。根据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的观点,翻译是一种体验性的认知活动,不同译者对原作的认知应具有一定共性,鉴于篇幅本文抽样选取李德纯(2004)、高慧勤(2008)、叶渭渠(2009)、林少华(2011)、津文(2016)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²⁾。

译介学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具有两重身份,对于原作来说,他是个读者,但对于译作来说,他是个输出者,译者在阅读原作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读者的创造性叛逆,而导致不同译者对同一语篇会有不同的理解。而这种现象与认知语义中的“主观性识解”不谋而合。所谓识解,就是指人们能用不同方式理解同一场景的能力(王寅,2012)。关于“主观性识解”,国内外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维度探讨了识解的内容。根据现代认知心理学和体验哲学有关意义的理论,Langacker、Taylor、Lakoff&Johnson先后对意义做了新的诠释:意义本质上是一种个体心理现象,同人类认知活动密切相关;意义是基于我们身体和大脑的,意义不可能完全是字面上的,而是隐喻性的,我们是通过激活人脑相关认知域、知识框架,再经过整合而获得意义的(王明树、文旭,2009)。

翻译既然是一种体验性的认知活动,那么“主观性识解”必然会在翻译中起重要作用。谭叶升(2004)、王寅(2008)、王明树(2009)、王明树,文旭(2009)等对不同汉英、英汉译文基于认知识解这一理论基础做了具体论述,本文尝试性地探讨日汉翻译过程中不同译者对日语拟声拟态词的处理方式,进一步证实不同语种的翻译中认知识解的问题,旨在说明该研究路径的普遍性。

“主观性识解”这一概念最初由Langacker提出,他指出识解主要包括5项要素: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突显。王寅教授基于这一理论基础,又将这5个识解要素归结于4类:详略度、辖域与背景、视角、突显。本文正是基于王寅教授、文旭教授对翻译中的认知表征方法,从各译本中选取案例来分析《伊豆の踊子》汉译本中的拟声拟态词的翻译方法和路径。

3 翻译中的“主观性识解”

本文以川端康成《伊豆の踊子》的5种日译本为例,主要从背景、视角、突显、详略度四个角度去探讨日语拟声拟态词类的翻译方法和翻译中的主观性的表征。

3.1 背景

前景背景理论框架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模型之一,该理论框架认为前景背景是建立在深厚的日常体验基础之上。兰盖克指出:“只要一个概念在先,某方面有助于另一概念的出现,都可归入前景和背景”(转自刘杰、于芹,2013)。理解任何一个语言表达式,都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作为基础,而本文主要论述背景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背景是指在描述事体的过程中,人们使用的表达式所激活的相关概念域配置及百科知识,译者借助已经建立的经验来理解新的经验并对译文进行处理,其中先前经验就是背景,具体可

表现为原作创作的背景知识，与原作者经历相关的背景知识，译语国家文化，译者经历和体验等（路玉，2017），就是与我们常说的百科背景知识有关。这一识解因素在《伊豆の踊子》的译文中可以通过以下译文进行分析。

[01] 暗いトンネルに入ると、冷たい雫がぽたぽた落ちていた。南伊豆への出口が前方に小さくあかるんでいた。【原文】

01-1：走进昏暗的隧道，冰凉的水珠吧嗒吧嗒地滴落下来。【高慧勤，2008】

01-2：走进黑魑魑的隧道，冰凉的水滴滴嗒嗒地落下来。【叶渭渠，2009】

01-3：走进昏暗的隧道，冷冰冰的水滴啪嗒啪嗒滴落下来。【林少华，2011】

01-4：我走近黝黑的隧道，冰凉的水珠嘀嗒答答流了下来。【李德纯，2004】

01-5：走进黑黢黢的隧道，冰凉的水滴滴滴答答地落了下来。【津文，2016】

「ぽたぽた」在《广辞苑》（第六版）中的解释为“しずくや小さくて柔らかい塊が続けざまに落ちて打ち当たる音。また、そのさま（形容水滴或细柔状物体接连滴落、打在地面等的声音及样子）。该拟态词在原文中是用来描写“幽暗又潮湿的隧道”里的滴水音与状态。5个译本中均译成为汉语中的象声词，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对水滴声的认知，但稍有不同，“吧嗒吧嗒”、“啪嗒啪嗒”会显得水滴的体积较大，描绘出水滴重重地打在地上的场景；而“滴滴答答”、“嘀嗒答答”会显得水滴的体积较小，描绘出水滴一滴滴地落在地上的场景。

我们认为，译者的主观性并不意味着任凭主观意识的自由发挥，而是基于译者对“水滴落下”的认知基础上进行的处理。认知手段不同，但认知的对象却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尽管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会发挥不同的认知，但其结果都是大同小异。

3.2 视角

视角指人们观察某件事的角度，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其实讲的就是观察角度的不同。译者选取的观察角度不同，译出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这与译者的主观性也有关联。

[02] 私は一人で活動に行った。女弁士が豆ランプで説明を読んでいた。すぐに出て宿へ帰った。窓闕に肘を突いて、いつまでも夜の町を眺めていた。暗い町だった。遠くから絶えず微かに太鼓の音が聞こえて来るような気がした。わけもなく涙がぽたぽた落ちた。【原文】

02-1：我无端地扑簌簌流下了眼泪。【高慧勤，2008】

02-2：不知怎的，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了下来。【叶渭渠，2009】

02-3：不知为什么，眼泪啪嗒啪嗒掉了下来。【林少华，2011】

02-4：泪水不知不觉地从脸颊滑落。【李德纯，2004】

02-5：不知不觉间，我已潸然泪下。【津文，2016】

从“ぽたぽた”翻译的处理方式来看可以反映译者注意力关注范围的不同。02-1与02-2均采用“扑簌簌”一词翻译，但内部句法结构不一样，02-1指向“我”如何流泪，02-2指向“眼泪”如何掉下，集中体现在主语的差异上。02-3虽然换成“啪嗒啪嗒”，

但与 02-2 有相同之处,即关注点在“眼泪”。而 02-5 与 02-1 类同,关注点在“我”。02-4 并没有对“ぽたぽた”进行翻译处理,但也不能称之为漏译或误译,译者关注点应该是“我”,具体来说“我”在临近分别时的心情变化。

从语言学角度看,我们认为任何结构都有它内在的意义,因为语法结构是由形式和意义匹配而成的。日语通过“ぽたぽた”这类拟态词来修饰关注对象“眼泪”掉下的状态,从 02 的汉译来看,虽然 02-1、02-4、02-5 形式上并不对等,但都实现了语义功能上的对等,这也在乎译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体现这一视角。

3.3 突显

突显,是指对语言所传达信息的取舍和安排。王寅(2008)指出“有了论述范围和视角,就要考虑抓住场景中的哪一部分进行描述,我们有确定注意力方向和焦点的认知能力”。人们注意力的焦点不同或对事物突显的焦点的不同,会体现出观察者想突出的关注点的不同。认知语言学认为:“认知主体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同一情景或事件,就可产生不同的认知过程和结果”(王寅,2011)。认知语言学的突显概念对翻译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如 [03] 中各译本对“きらきら”的解读,可以看出译者选择性突显的信息。

[03] 私が読みだすと、彼女は私の肩に触る程に顔を寄せて真剣な表情をしながら、眼をきらきら輝いて一心に私の額をみつめ、瞬き一つしなかった。【原文】

03-1: 我一开始念, 她就把脸凑过来, 都快挨上我的肩膀, 表情十分认真, 眼睛闪着光芒, 聚精会神地盯着我的前额, 一眨也不眨。【高慧勤, 2008】

03-2: 我一开始朗读, 她就立即把脸凑过来, 几乎碰到我的肩膀, 表情十分认真, 眼睛里闪出了光彩, 全神贯注地凝望着我的额头, 一眨也不眨。【叶渭渠, 2009】

03-3: 我刚开始念, 她就凑过脸, 几乎碰到我的肩, 一副一本正经的神情, 眼睛一闪一闪地盯视我的额头, 眨都不眨一下。【林少华, 2011】

03-4: 我开始念起来, 她把脸几乎贴到我的肩上, 一本正经, 一双闪着晶莹美丽光芒的眼睛, 目不转睛地盯视着我的天灵盖, 眼睛一眨也不眨, 这好像是她求人替她念书的一种习惯动作。【李德纯, 2004】

03-5: 我一开始朗读, 她就立即把脸凑过来, 差不多已经碰到了我的肩膀, 表情格外认真专注, 眼睛闪闪发光, 全神贯注地凝望着我的额头, 一眨也不眨。【津文, 2016】

“きらきら”在日本国语大字典中释义是“光り輝くさま、きわだって立派なさまを表わす語”,表示的是发光的一种状态。五个译本均符合此义项,但从构句来看译者的关注点不尽相同。03-1 采用体标记“着”表示动作正在进行,03-3 和 03-5 采用的是叠词结构强调动作的过程,而 03-2 采用的是体标记“了”表示动作的结果。03-4 则与前面都不同,并没有突出动作,而是采用了定中结构表示一种状态。

译者在读取这类拟态词时,可以聚焦动作状态发生的过程,或聚焦其发生的结果,或聚焦于一个瞬间点,从而形成了译语采用的不同表达形式。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作为译者,有确定注意力方向和焦点的认知能力,“突显”的方法也反映了译者在主观上对

事件感兴趣的部分。

3.4 详略度

所谓的详略度，指的是说话人对事物进行详细或简略的描写。由于每个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体验不同，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认知应具有不同的精细度，也就是说，对同一个事物的认知既可以是粗略的，也可以是详细的。这种对事物认知的差异，反映在语言上便是表达时而详细，时而简略，也表现在选词的范围不同。王明树（2010）指出“详略度可能出现在词汇层面，如名词、动词等，也可能出现在句子、段落，甚至整个语篇层面”。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不同译者在描述同样的现象时，其详略度难免会不同。如 [04] 中各译本对“ことこと”的解读，便可以看出译者在描写时对原作信息做出的处理。

[04] 私は朗らかな喜びでことこと笑い続いた。頭が拭われたように澄んできた。微笑がいつまでもとまらなかった。【原文】

04-1：我好开心，爽朗地笑个不停。仿佛尘心一洗，头脑也清亮起来。脸上始终笑眯眯的。【高慧勤，2008】

04-2：我更是快活兴奋，又嘻嘻地笑了起来。脑子清晰得好像被冲刷过一样。脸上始终漾出一丝丝微笑。【叶渭渠，2009】

04-3：我满心欢喜，呵呵笑个不停，脑袋一清如洗，微笑很久没从脸上退去。【林少华，2011】

04-4：我因为亢奋，脸上久久泛着一丝微笑。我的头脑异常清醒，就这么长久地微笑不止。【李德纯，2004】

04-5：我愈加兴奋和喜悦了，又嘻嘻地笑了起来。脸上始终漾出一丝丝微笑。脑子也清晰得好像被冲刷过一样【津文，2016】

认知翻译学认为这一识解因素并不仅从单词量的多少来衡量，而具体体现在译者对原作中相关信息的增减。笔者将 5 个译本中对该词的翻译结果按照字数多少以及信息详略的顺序，作如下排列：

略—————→ 详
“嘻嘻地”/“呵呵”→“爽朗地”→“脸上久久泛着一丝”

《广辞苑》中该词的解释为“堅いものが連続して軽く打ち当たる音”（形容硬物连续轻微碰撞的声音）³⁾。04-2、04-3 和 04-5 都是用汉语象声词来再现了原作中的声音，其与原作的详略度一致。而 04-1 和 04-4 虽略去原作的“声音”这一信息，但也不能称为漏译或误译，两者的详细度都大于原作：04-1 的处理手法，能让读者在联系语境的情况下体会到当时主人公性格的转变，而 04-4 则增添了主人公的神态信息，更加详细地描写了原作的情景。详略度的差异就像从不同距离来观察物体：距离越小，就看得越详细；距离越大，就看得越不详细。对事物描写的详略不同，也能反映出译者在主观上把焦点放在哪些部分上。

4 结语

本文以《伊豆の踊子》的不同汉译为例,着眼于日语中的拟声拟态词,用一些具体的翻译实例阐述了翻译的主观性识解。分析中把“识解”作为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了日汉翻译中的主观性,主要从背景、视角、突显、详略度这四个方面分析展开了探讨。

透过《伊豆の踊子》,可以看出拟声拟态词在各译本中存在诸多共同点和不同点。从形式上看有象声词、副词、重叠式表达、动词短句以及省译等方法。针对这些不同译文,一方面,进一步说明译者的理解和翻译带有主观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认识到,翻译实践中这些译法的分歧应成为翻译学科系统理论所要研究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本文通过认知语言学基本原理对日汉翻译中的这些分歧做出了说明和解释,把翻译中的主观性从理论上做出进一步描写和印证,也可看出“识解主观性”观点在不同语种的翻译研究的适用性。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8YY24)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YY18214)

注

- 1) 2021-2023 年期间的译本出版剧增,谭晶华、施小炜、徐建雄、郑民钦等译者的首版、再版译本有 40 余册,鉴于篇幅以及定性研究的目的,本文只列举到 2020 年的部分数据。
- 2) 据笔者调查,林少华的这 3 个译本的内容并无太大改动。此外,叶渭渠的 2009 年译本跟 2010 年的译本在内容上也无太大改动。
- 3) 括号中日语拟声拟态词的汉语解释,为笔者自译。

参考文献

- [1] 川端康成.伊豆の踊子[M].東京:角川文庫,2001:6-43.
- [2] 陈岩.新编日译汉教程(第3版)[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84.
- [3] 川端康成.伊豆舞女[M].李德纯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1-26.
- [4] 川端康成.雪国[M].高慧勤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26.
- [5] 川端康成.雪国·伊豆舞女[M].叶渭渠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218-269.
- [6] 川端康成.伊豆舞女[M].林少华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1:1-28.
- [7]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作品集[M].津文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1-22.
- [8] 刘杰,于芹.认知语法中“前景/背景”理论[J].合肥学院学报,2013,30(3):32-36.
- [9] 路玉.认知“识解”理论视阈下李白《长干行》的英译差异性研究[C]//贵州省翻译工作者协会2017年年会暨“一带一路”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化外宣翻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铜仁:铜仁学院,2017:24-33.
- [10] 孙文慧.《伊豆的舞女》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6.
- [11]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2005,26(25):15-20.
- [12]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概念化”对翻译中主客观性的解释力——一项基于古诗《枫桥夜泊》40篇英语译文的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40(3):211-217.
- [13] 王寅.什么是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94.
- [14] 王寅.认知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12,33(4):17-23.
- [15] 王明树,文旭.“主观化对等”在翻译中的应用——以李白诗歌《送友人》为例[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8):62-65.
- [16] 王明树.“主观化对等”对原语文本理解和翻译的制约——以李白诗歌英译为例[D].重庆:西南大学,2010.
- [17] 谢天振.译介学(增订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26+129+135.

松冈荣志新译《诗经》的颜色词体认构建

左玉林

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卢冬丽

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北陆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1 引言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 11 世纪至前 6 世纪）的诗歌，共 311 篇，反映了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的中国面貌。“《诗经》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难以估量的伟大价值”¹⁾，是一部可以让各国读者从中寻觅人类共同情感思维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文学”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文学典籍，目前有日、韩、英、法、德、俄、越南语等 20 多个语种的译本。可由于岁月的风沙将历史掩埋，很难找到《诗经》最早海外流传情况的具体记载。但《诗经》沈博绝丽，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意义重若丘山，其译介研究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

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诗经》日文译介引导了日本文学审美的演进与流变，诸多日本诗歌的创作都可在《诗经》中找到出处，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与《诗经》在内容、风格上都有相似之处。王晓平在《〈万叶集〉对〈诗经〉的借鉴》一文中提到了正冈子规的观点：“《万叶集》大量运用了汉语俗语”，并指出其中不乏直接来源于《诗经》的词语、“比兴”的表现手法以及一些相关意象²⁾。追本溯源，自公元九世纪日本第一个《诗经》抄本出现以来，对《诗经》的选译、全译和评介就未曾中断。十几个世纪以来，《诗经》一直是日本的学术热点²⁾，涵盖了译注、讲解、汉文名著翻刻等多个方面，十九世纪，中国的汉、宋和清代的《诗经》在日本大量翻刻，并涌现出大量研究论著²⁾。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诗经》译介与研究依旧繁荣，中叶以后，日本汉学界以老一代翻译家如目加田诚、海音寺潮五郎、石川忠久为代表又推出新译，计全译 6 部³⁾，摘译、节译以及普及读物多达几十种，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日本文化生态环境。面对汉学学术圈的《诗经》全译本皆保留注疏传统，毛诗注疏《诗经》复译再版³⁾。但步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诗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典籍在新世纪日本的传播陷入困囿。2015 年，松冈荣志（以下简称松冈）《诗经》新译本以大众传播为导向，以未来读者为本位⁴⁾，放弃了注疏传统，一改以往的汉文训读法，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阐释，“延续了战后《诗经》翻译‘回归文学’的小传统。自此，松冈成为首位使用现代日语全译《诗经》的译者，使先秦的贵族之歌走下神坛成为现代普通日本人的诗歌，对古籍‘经学’进行了现代性的祛魅”³⁾，为《诗经》在日本的传播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赋有创新性意义。

2 从体认语言学到体认翻译学

继西方哲学由人本性和批判性向解构性和破坏性转向后，又迎来后现代第三时期，即建设性和体验性时期，极大影响了西方认知语言学的发展⁵⁾。1999年Lakoff和Johnson合作出版了《体验哲学——体验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一书，在西方语言学界引起极大反响⁶⁾。本杰明·伯根(Benjamin Bergen)指出，体验性研究包括若干次话题，其中有意象图式和隐喻⁷⁾。就意象图式而言，很多词汇能够借助意象图式来限定他们的构成方式，如形容词，而体验性隐喻主要探讨我们如何基于具体感知来思考和谈论抽象概念⁷⁾。

国内真正探讨“体认”一词最早出现在1988年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发表的《“识仁”、“体认”和“为道”》一文中，指出“体认，也是道学中的一个术语”，即“体认”一词源于中国道家哲学。“‘体认’就是说由体验得来的认识，这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一种经验，是一种直观，不是一种理智的知识。”⁸⁾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于文学、语言、教育、政治、历史、艺术等领域。1996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荣发表的《言说与存在：心学的一个向度》一文，体认概念初次与语言元素接触。上世纪末国内的体认研究大多围绕此思路展开，主要涉及语言方向的体认哲学研究，并没有真正关注语言学本身，即包含语言元素的体认哲学研究。2014年，以王寅教授发表的《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一文为嚆矢，“体认语言学”一词出现。该文标志着国外“认知语言学(CL)”本土化的成功转向，奠定了体认语言学的基础。此后，体认语言学研究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大量活跃在汉语词法、语法领域(卜小倩, 2022; 汪思静, 2022)，之后渐渐向外语研究与教学领域靠近(杨运杰, 2022; 黎靖培, 2022)等。2020年，王寅教授结合体认语言学与翻译学，在《体认翻译学视野下的“映射”与“创仿”》一文中鲜明提出“认知翻译学”向“体认翻译学”的转变，并于2021年发文构建体认翻译学研究范式，“对世界范围内语言学和翻译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边缘学科”⁹⁾。

体认语言学大力倡导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严厉批判语言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倾向，坚决认为语言的本质不在于先验或天赋，而在于体认¹⁰⁾，补充了“认知语言学”名称中只讲“认知”而未能突显其来源的缺陷¹¹⁾。然而体认语言学以及翻译学理论目前缺乏合适的翻译策略指导翻译实践，仍有很大探索空间。体认理论体系中，“体”意在突显人类的思想、语言、意义具有体验性，是基于我们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而成形的；“认”意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本精神，即在我们的思想、语言和意义中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主观烙印。¹²⁾而古典诗歌本身具有丰富的音乐性，语义蕴藉，其翻译极其依赖译者的体认基础，因此体认理论体系拥有适用于诗歌文本翻译研究的优势。

诗歌翻译研究方面，虽然目前已有部分本土化翻译理论较为成熟，但缺乏时代性以及系统性。许渊冲“三美论”以文本为中心，停留在诗歌音形意的体验视角，缺乏译者及读者认知维度的考量，且其诗歌译作几乎全为汉英翻译，未必与日译研究契合。而叶维廉的诗性美学思想，总体来看是对诗歌美学的思考，其中只有一部分涉及翻译模式，与中国传统翻译学宗旨相背离，并不是翻译理论本土化发展的最适选择。因此，相对于前两者，体认理论指导下的《诗经》日译研究是国内日译生态现实对本土化理论的生态

选择,是新的探索与挑战,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而颜色词作为体认的最直观表征之一,蕴含非凡的民族文化特质,因生活环境、历史文化、思维方式等因素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视觉联想和心理效应。在此,本文借助体认语言学及翻译学理论,兼并构式语法的分析思路,以《诗经》颜色词的体认为切入点,构建松冈颜色词日译的体认图式,聚焦观察颜色概念在特定语言构式中的组构方式,从语义、语构、语用三个层面分析松冈翻译过程中的体认构建,为中华诗歌典籍的日译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3 松冈《诗经》颜色词日译的体认图式

松冈《诗经》日译本中,颜色与译语语言的关系可以从颜色概念化、颜色图式和语言生成三个维度加以分析。然而,松冈的翻译过程不是三个步骤单一的单线认知串联,而是经历了双重体认过程。一重是原作者对于现实色彩的体认,另一重则是松冈对于文字表征的颜色效用的体认。笔者参照体认语言学的研究范式⁵⁾,描绘颜色词事件结构的认知图式表征如图1,呈现松冈颜色词翻译过程中独特的体认传递、认知递减以及多向互动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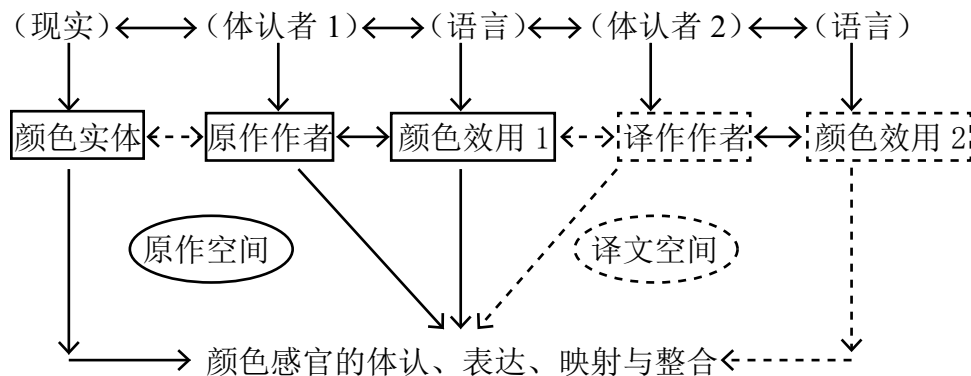


图1: 松冈《诗经》颜色词日译认知图式

体认翻译学认为原作的生成和翻译都是体认活动。原文是作者将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想运用概念整合机制而形成的作品,译文则是译者在对原文解构(概念分裂)的基础上再经概念整合的结果,那么翻译过程具体来说就是概念不断进行映射和整合的体认过程¹³⁾。如图1所示,“认知主体”(体认者1、2)位于中心,体现了认知加工过程中概念化者的主观识解能力。“颜色实体”作为引起认知主体反应的外在刺激,其和体认者之间的影响是精神性的和抽象的,用虚线表示。随后,这种作用通过认知主体的心理加工,外在显化为“颜色效用1”,用实线表示,其语言文字形态表征为《诗经》原作中的颜色词。通过以上步骤构建了颜色意义系统。整体上,三者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¹⁴⁾。

原作与译作的认知主体通过“颜色效用1”,即《诗经》文字相关联,译者也就是“体认者2”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先秦时期的质朴色彩,但通过“体认”原作者的体认,进行体

认解构，再经由概念整合，“并构、完善、精细化”¹³⁾（王寅，2020:751）等处理构建译者的“译文空间”，生成译者构建后的颜色实体，即“颜色效用2”。“颜色效用1”和“译作作者”之间的连接经历了译者解构与并构，故而用虚线表示，而“译作作者”和“颜色效用2”之间存在着译者解构、并构后的近似映射，故而用实线表示。“颜色实体”“颜色效用1”“颜色效用2”通过“原作者”和“译作作者”达成“颜色感官的体认、表达、映射与整合”。然而由于体认在从原作者到译作作者间的传递过程，原荷载信息呈递减趋势，译文空间用虚线表示。因此，在这其中，对于历史色彩的感知成为翻译最大的难题之一，深度分析日译颜色词的语义、语构以及语用认知模式，方能更精准地把握松冈日译颜色词的体认构建思路。

4 《诗经》及新译中颜色词使用概述

《诗经》中的颜色词汇可分为白、红、黑、黄、青、绿七大色系。白色出现 34 次，黄色 20 次，红色 9 次，绿色 8 次，黑色 6 次，青色 4 次，彩色 1 次。如表 1 所示，白色系的颜色词出现频率最高，有“素、缟、白、皙、皎”5 种，多用于描绘贵族服饰、马匹、玉器。红色系颜色词出现频率次高，有“赭、赫、彤、丹、赤、奭”6 种，但是分类最为细致，多用于“王室”“公言锡爵”等场合。商周时期色彩世界崇尚红白两色，以其为主，甚至以其为尊，可窥见一斑。然而，白色又在中国文化中指代丧事，蕴含悲凉哀伤的语义，如《桧风·素冠》中有“庶见素衣兮，我心伤悲兮！”这也显示出色彩语义的多样性。同样，据《古事记》所记载的神话故事，古代日本最初只有白、黑、青、赤四色。白色是万物的开始，是最初存在的颜色。因此，日本自古认为白色象征了神圣、纯洁和高雅。红色在日本也具有多重象征意义。一方面，大和民族认为红色是带来光和热的太阳以及火的颜色，尊太阳女神为始祖，以红色为尊。另一方面，日本民俗中有“赤不净”的观念，红色也因此被视为禁忌色¹⁵⁾。因此，中日对于颜色词的认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要求译者经过深层体悟，加深对于颜色词的认知。

色系	词汇	次数	日译	色系	词汇	次数	日译
白色	素	12 次	白い	黄色	黄	19 次	黄色、黄ばんで、栗-、黄色い、コウライウグイス、黄金色、黄橙色、枯れない
	缟	1 次	白い		芸	1 次	黄橙色
	白	15 次	白く、すきとおる、きらきらと、白い、白-（白馬）	黑色	缁	4 次	黒い
	皙	1 次	色白		幽	1 次	黒々と
	皎	5 次	明るい、白い		玄	1 次	くさらない

红色	赭	1 次	赤い	绿色	绿	7 次	緑、コブナグサ
	赫	1 次	紅く		綦	1 次	緑
	彤	2 次	赤い、きれいな	青色	青	4 次	青く、青々、青い
	丹	1 次	真っ赤、紅	彩色	绣	1 次	五色
	赤	2 次	赤い				
	赧	2 次	朱、真っ赤な				

表 1：《诗经》颜色词对译表

据上表 1，松冈《诗经》日译本中，白色出现 30 次，黄色 10 次，红色 8 次，绿色 6 次，黑色 5 次，青色 4 次，彩色 1 次。白色系译为“白い、すきとおる、きらきらと、明るい”4 种；红色系译为“赤い、紅く、真っ赤、朱、きれい”5 种；黑色系译为“黒い、くさる”2 种；黄色系译为“黄色い、栗、黄金色、黄橙色、枯れる”5 种；绿色系译为“緑”1 种；青色系译为“青い”1 种。且不论《诗经》译文颜色词是否能与原文中涉及的颜色一一对应，就仅依据色系词种数量，《诗经》日译颜色词种总量明显减少。整体而言，松冈体认《诗经》源文本的色彩世界后，以删繁就简的翻译手法，面向现代乃至未来读者，构建出中国先秦时代社会生活最直观、最鲜明的色彩模块。其日译本折射出蒙德里安配色，以颜色简笔图描绘先秦时期中国人民生活，与快节奏下现代人简约自由的色彩观念相合，符合大众古朴典雅的色彩审美品味。

5 松冈《诗经》颜色词新译的体认构建

颜色词作为不可或缺的语言要素，带着独特的民族思维和心理认知效应。即便描述同一种颜色，中日颜色词在语义、语构、语用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松冈正是凭借对原文质朴颜色的深度体认，经由对颜色词的多重概念分裂与融合，采用灵活“并构、完善、精细化”⁹⁾的融合方式调整译语，才产出了真正面向未来读者的《诗经》译文。

5.1 颜色词的语义体认构建

颜色词的语义，即词汇的字面含义，是最直接的颜色词含义表征。如“素”代表白色色系，而“赤”代表红色色系，两者的语义完全不同。松冈通过译者自身的体感认知对《诗经》中颜色词进行语义解构，然后在融合空间中形成某种关系，注入译者的知识背景并构完善认知框架，主要有以下四大路径。

第一，对于一对一的语义映射词汇，译者精准稀释语义，直接翻译相关颜色词。源于类属空间中的相似部分，中日颜色词语义呈现出一一对应的镜像网络映射关系。例如，对于诗经中出现频次最少的彩色“绣”色，松冈将其译为“五色”。《周礼·考工记·画绩》记载“画绩之事……五采备谓之绣。”“五采”即为青、赤、白、黑、黄五色（见于《古代汉语词典（第二版）》）。《大辞林》也有记载“五色”为五种颜色，多指赤青黄白黑。因此，

日文“五色”与“绣”色的语义一致。面对这种概念镜像网络,松冈采用镜像对译,映射出其语义。

第二,面对多对一的语义差异,译者解构分裂颜色概念,精细化翻译用词。由于输入空间认知本体的差异性,译者空间中的颜色词与作者空间的颜色词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同一色系的颜色词,也会出现中日颜色词语义不同的情况。如“素”在《古代汉语词典(第二版)》释义如下:① 未经染色的生绢,引申为白色 ② 本然的,未加修饰的 ③ 真情 ④ 蔬菜、瓜果类食品 ⑤ 一向,平素 ⑥ 预先。而松冈日译的“白い”,语义为能识别颜色为白色的状态。因此,“素”和“白い”的语义概念并不完全对等,只在特定语境中语义相通。译者必先深入理解、体悟颜色词所处语境,采用“概念分裂”的心智策略,依据特定语境从这两个词的多义范畴中分拣出一个适合的意义⁹⁾,解构颜色词的语义概念,进而精准决策是否并构、怎样并构,把握译语用词,用现有译入语材料进行翻译。

第三,对于同一个颜色词一对多的语义差异,译者依托语境完善颜色词深浅表述。如“奭”色,松冈翻译为“朱”(《小雅·采芣》)和“真つ赤”(《小雅·瞻彼洛矣》)。“朱”,意为红色或者稍微带点黄色的红色(见于《大辞林》)。“真つ赤”,意为极其红的状态(见于《大辞林》)。虽然都是红色相关的颜色词,二者有明显的浓度及纯度的差异。“奭”,赤色,比朱红稍浅的颜色(见于《古代汉语词典(第二版)》)。相较之下,“朱”的语义更加符合“奭”色,而“真つ赤”在语义上应当比“奭”色浓度更高,颜色更深。细究原文,“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鞶革。”(《小雅·采芣》),描述了举兵出师前王师部队的军容盛大。松冈在此用浓度相似的“朱”,用写实的手法,细致刻画了兵强马壮,饰品考究的部队风貌。而“韎韐有奭,以作六师”(《小雅·瞻彼洛矣》),描述了洛水岸边众将士严阵以待,士气齐天的画面。松冈在此用浓度更高的“真つ赤”能联想到战争的血腥之色,让读者身临其境,深切感受到战争的紧迫感。而这就是松冈一色多译的良苦用心,深切体认了《诗经》原文的语境,解构“奭”色的红色色系,联想至战争事件的颜色图式,并构出更贴合语境的颜色概念“真つ赤”。由此,更精细化地作出颜色效用,完善译者空间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体认主体与颜色效用之间是双向影响的。

第四,对于颜色词零对一和一对零的语义差异,松冈新译中译者打破感官壁垒,进行多维阐释翻译。松冈在原作空间和现代中文翻译空间的语内翻译碰撞与交融中,并构语境含义,创造性生成日译本的颜色概念。松冈尤其注重从颜色的饱和度、透明度或质感来间接描写颜色。“滌池北流,浸彼稻田”(《小雅·白华》),程俊英、蒋见元(2015)将其翻译为现代中文“滌池河水向北流,灌溉稻田绿油油”。其中“绿油油”一词就是现代中文语内翻译中的颜色视觉显现。松冈参照两大文本空间,译为“滌池は 北に向かって流れ イネの畑を どこまでも 潤して”。其中“潤し”意为给予水分(见于《大辞林》)。“潤し”解构出稻田意象图式,运用体认通感构建,跨越视感概念转变为触感概念,描述出绿色稻田给人的湿润质感,从质感上反映物体的颜色效用。

5.2 颜色词的语构体认构建

颜色词的语构,即颜色词的语言结构。中文作为孤立语,单词没有形态变化,一个

词根就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且在中文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之中,“转注和假借”并未产生新的文字,属于形声的一部分,即严格来说只有4种造字法,其中有3种是表意的。因此,汉语一字所蕴含的语义内涵丰富,能描述出复杂的色彩。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秦风·终南》)“黻”指古代礼服上绣的青与黑色相间的亚形花纹。《周礼·考工记·画》记载“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见于《古代汉语词典(第二版)》)然而,日语作为黏着语,通过名词、动词等词尾,粘贴不同的尾词,来实现语法功能。如“黒と青の上衣 五色の袴”,译者在解构颜色词语义概念后,并构日文文字结构,精细化使用了“と”“の”等助词,以表明颜色的多样性,以及颜色词与物体的修饰关系。除解构以上中日颜色词语构差异之外,松冈并构日语颜色词的语构特点,精细化日语颜色词的用词,真正为读者带来一体多维的体认感官联想构建。

第一,译者灵活并构日语颜色词的屈折变化。“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郑风·子衿》)松冈译为“あなたの えりもと きりりと青く”。“青青”是形容词,描述了衣领的颜色,松冈将其对应日语形容词“青い”,并从连体形转换成连用形,而汉语颜色词则没有这种词形变化。这里“青く”句末的“く”是形容词中顿形式,松冈在解构原文视感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视感概念结构转变为听感概念结构,给与了读者除视觉以外的听觉审美享受。由此,通过放大颜色效用,美化意图传递的体认实感,复现原文色彩,同时传递出诗歌的音乐性,构建从视觉到听觉的感官关联体系,给读者带来感官体验多维共通的颜色效用。

第二,译者“精细化”改变颜色词词性。在译文空间中,“颜色名词+形容词词尾‘い’”的构式,表征出体认者对颜色实体的概念化内容,区别显示不同颜色的语构差异,体现出体认者对于不同颜色的识解过程,即先体悟、解构颜色色相,再比照、并构相关颜色图式,接着决定、完善颜色属性,最终精细化产出译文表达。但松冈不是单一地使用“颜色名词+形容词词尾‘い’”的形容词构式表征,而是灵活变构颜色词词性,引发读者深度联想。如“赤芾金舄。”(《小雅·车攻》)现代中文语内译文为“大红蔽膝金头鞋”,描述了诸侯驾马围场打猎的场景。松冈译为“赤い膝かけ 金のくつ”,日译文的“金”为名词,引人联想至金块,凸显鞋子的颜色,又暗示鞋子之金贵,描绘出“国王设宴、诸侯围猎”,极尽奢华气派的场景。“金”这一颜色词词性从原文的形容词转变至译文的名词,扩大了颜色词的语义概念域,发挥出体认者释放的颜色效用,强化读者体感知,原作者、译者以及读者的三重体认环环相扣,相互融通。

第三,译者并构使用日语中特有的外来语,贴近现代日本读者。如“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小雅·黄鸟》)“黄鸟”这一下位范畴的命名本身包含了颜色表征,而这一物种对于现代日本读者并没有那么熟悉,不属于其意象图式中的基本范畴。松冈使用贴合日本年轻读者群体的外来语“コウライウグイス”(Black-naped Oriole, 黑枕黄鹂),缩短了读者之于文本的体认距离,让读者觉得更加亲切,更便于理解原文所指物种。这种“颜色隐身”,让原文的颜色通过实体表征,引发读者的自然联想。简而言之,译者通过颜色概念解构和事物概念并构,即概念分裂和整合,再次映射原文颜色概念,更加精细化还原颜色图式细节。

5.3 颜色词的语用体认构建

颜色词的语用即颜色词在一定的语境中的运用效果。松冈《诗经》日译颜色词的语用建构为读者带来了颜色的超时空体认。译者作为体认主体，娴熟运用中日色彩文化图式，灵活采用“并构、完善、精细化”⁹⁾的融合方式，释放颜色效用。日译的颜色词带来颜色色相的语义信息，同时引发读者联想共同颜色意象图式中的语用意义。

首先，译者精细化隐匿颜色词，淡化乃至消解颜色痕迹，完善相关意境，达到精细化效用，引发“原作者-译者-读者”的三维意象图式重映。基于此，松冈采用并构意象堆叠的方式，展现对于该事物的意象图式。这是译者个体体认的结果，更生成了多维认知传达空间。如“白华菅兮，白茅束兮。”（《小雅·白华》）原文重复“白”，以保持诗歌韵律上的音乐美感。松冈译为“白い綿毛の カルカヤ刈って 茎でしばって 束にした”，“カルカヤ（白华，即白花）”前用颜色词“白い”修饰，已然并构生成了读者认知中“（白い）茎”的颜色意象图式，故而精细化去除了“茎（茅草）”前的“白い”，简洁明了的同时保证了日译句式工整，增强了译诗的音乐美感，从视听多维层面于读者空间再现了白花的形色意象图式，有效牵引原作者对于白花的感知经由原文文本、译文文本，逐级流入读者空间。

并且，松冈联通与作者空间相似类属空间，点明隐喻语义，精细化剔除颜色词，完善诗歌意境。如“何草不黄？”（《小雅·何草不黄》）原文用“黄”这个颜色词映射隐喻植物枯萎时的色彩状态，并非介绍草的颜色色相，而是借助颜色表达植物终会枯萎的生态规律意象。松冈直击颜色词的语用意义核心，译为“枯れない草なんて あるのか”（有不枯萎的草吗）。鉴于人类对于植物枯萎事件拥有共同的意象图式，“枯れる（枯萎）”自然能引发读者空间重映植物枯萎时黄色的色彩状态。译文采用抽象概念具体化的隐匿平衡方法，达成准确解构“黄”隐喻“枯萎”的语用目的，且不失其中蕴含的颜色语义。

另外，在原文没有直接的颜色表述的情况下，译者显化颜色词，并构完善相关语境，呈现颜色图式。如“台笠缁撮。”（《小雅·都人士》）译为“白い草の帽子に 黒い頭巾”。“缁”意为黑色，对应“黒い”，然而“台”为莎草（见于《古代汉语词典（第二版）》），并未提及颜色。莎草分布于中国华北、中南、西南地区及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台湾等地，在日本并不常见。如果直译草名，日本读者无法联象，也无法自主构建出干莎草制作的草帽颜色图式。因此，松冈淡化原料莎草的名称，显化颜色词“白い”，将“都人士”的外观色彩完善的愈发清晰，给读者呈现出千年之前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国百姓服饰色彩搭配的意象图式，实现“面向未来读者”⁴⁾的认知传承的语用目的。

6 结论

《诗经》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塑造了海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集体性想象，其在海外传播尤其是对日传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本文结合体认语言学、体认翻译学理论，分析松冈《诗经》现代语日译颜色词的体认模式，从语义、语构以及语用三方面剖析日译颜色词的体认构建。研究发现，松冈整体采用删繁就简的翻译手法，使得《诗经》日译本呈现出蒙德里安配色，适配快节奏下现代人简约自由的色彩意识和品味，为现代

乃至未来读者最直观地描述出中国先秦时代社会生活最鲜明的色彩模块。

具体来说,第一,语义方面,中日颜色词的语义广度和深度存在偏差,呈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等差异性分布。松冈依托对实际语境的解构,完善颜色词语义表征,并且依附体认带来的认知分析,采用镜像对译、“概念分裂”等翻译策略,“精细化”抉择语义深度,零度距离复现作者空间。第二,语构方面,中文颜色词语义丰富,一字多彩,言简意赅,但词形没有变化,而日文颜色词语义单一,瘠义肥辞,具有屈折变化,词性多样,灵活百变。松冈解构中日颜色词语构差异,并构日文颜色词词性、屈折形式以及语言成分等特点,经“完善”和“精细化”的加工,映射入融合空间,为读者带来一体多维的体认感官联想构建。第三,语用方面,中文丰富的语义属性促使语用功能多样化,中文颜色词大量使用转喻,而日文颜色词的转喻语用较少,多为直抒胸臆。松冈采用并构意象堆叠的方式,精细化、显隐化颜色词,完善相关意境,释放颜色效用,引发“原作者-译者-读者”的三维意象图式重映,不失诗歌意境且保全诗歌语义,简洁明了,易于理解,增强了在现代日本读者间传播的可能性。

中国经典诗歌的外译是一个历史的、源源不断的生成过程。译者面向不同时代语境的读者,全面深度解构中日诗歌语义、语构、语用差异,方能精准“并构、完善、精细化”译文文本,进而生成面向未来读者、适应时代生态且易于流传的译本。今后,笔者在颜色词视觉体认研究的基础上,将着重关注松冈现代日语新译《诗经》的音乐性,尝试将体认翻译学与表演性理论相结合,将表演性(performativity)这一学术术语引入至译者体认研究领域,创新性开拓翻译研究视野,探讨松冈体认映射、整合过程,进而呈现《诗经》视听盛宴的建构空间。

注

- 1) 夏传才.略述国外《诗经》研究的发展[J].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2):74-81.
- 2) 廖瑾瑜,任晓霏.《诗经》在欧亚传播与影响对比研究——以日本与法国为例[J].大众文艺,2019(10):18-19.
- 3) 吴昊.唱给未来的远古歌谣——世界文学视阈下大中华文库《诗经》日译研究[J].黑河学院学报,2023,14(02):104-107.
- 4) 曹新宇,金锦珠,松冈荣志.翻译是一种缘分——日本翻译家松冈荣志访谈录[J].东方翻译,2019(06):46-52.
- 5) 王寅.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4-15.
- 6) 马春雨.“体验哲学”对西方传统语言学的挑战[J].外语学刊,2004(03):35-40.
- 7) Bergen, Benjamin. 2019. Embodiment [G] // Ewa Dąbrowska & Dagmar Divjak.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11-35.
- 8) 冯友兰.“识仁”、“体认”和“为道”[J].中州学刊,1988(04):53.
- 9) 王寅.体认翻译学视野下的“映射”与“创仿”[J].中国外语,2020(05).
- 10) 王寅.体认语言学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30(02):7-17+110.
- 11) 王寅.从翻译的认知观、认知翻译学到体认翻译学[J].语言教育,2023,11(04):72-80.
- 12) 王寅.体认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J].中国翻译,2021,42(03):43-49+191.
- 13) 王寅.概念整合理论的修补与翻译的体认过程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5):749-760.
- 14) 王晓伟.基本情感的体验语义与认知动因分析——以英语“情感形容词+介词”构式为证[J].外国语文,2023,39(03):72-82.
- 15) 王正春.日语颜色词的象征意义与文化[D].中国海洋大学,2015.

参考文献

- [1] 卜小倩. 体认语言学视域下汉语谜语的认知机制研究 [D].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2.
- [2] 汪思静.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三国人物歇后语的概念整合研究 [D].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2.
- [3] 杨运杰.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的唐诗隐喻翻译研究 [D]. 西华大学, 2022.
- [4] 黎靖培. 体认视角下小学英语绘本多模态教学研究 [D].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2.
- [5] 松冈荣志, 程俊英, 蒋见元. 诗经 — 大中华文库 (汉日对照)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5.

論文執筆者一覧

祁福鼎	大連外国語大学公共外語教研部教授
尹 瑛	大連外国語大学日本語学院碩士生
鄧凌志	浙大寧波理工学院外国語学院講師
張秀閣	北京科技大学講師
熊 磊	江西師範大学講師
劉臻勝	江西服装学院助教
左玉林	南京農業大学外国語学院碩士生
盧冬麗	南京農業大学外国語学院副教授，北陸大学国際交流中心副教授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研究』論文執筆要領

1. 投稿は日中翻訳文化教育協会の正会員に限り、原稿は未公開のものに限る。
2. 原稿は横書きとし、使用言語は日本語または中国語とする（英語も可）。
3. 原稿は原則として、日本語については常用漢字を使用し、中国語については簡体字を使用するものとする。ただし、必要があればその限りではない。
4. 日本語の原稿は 43 字× 35 行× 10 ページ以内、中国語の原稿は 20 字× 35 行× 20 ページ以内とし、手書きの原稿は不可とする。
5. 原稿の上限は、文字数ではなく、原稿のページ数による。引用文等の字下げおよび改行等による空白も文字数に換算されるので注意すること。また、図版を必要とする場合も、相応の文字数分を含めるものとする。なお、図版のデータは本文のデータとは別に提出すること。
6. 注は各章・節ごとに付けず、文末にまとめて付すこととする。また、注番号はすべて通し番号とし、本文中に（ ）付き数字により示すこと。ソフトウェアの注機能等は使用不可とする。
7. 引用箇所等のインデントは、行頭にて（2 字下げ）（3 字下げ）等と明示すること。
8. 応募時に、原稿とは別に 2000 字以内の論文要旨を添付すること。
9. 原稿は電子メールによる投稿とする。郵送および持参は認めない。
10. 投稿時の事故に備え、提出前にあらかじめ論文原稿のデータを複製しておくことが望ましい。
11. 執筆者校正は再校までとする。校正時の加筆・訂正は必要最小限のものについてのみ認める。
12. 論文抜刷は作成しない。
13. 掲載論文については、その著作権は日中翻訳文化教育協会に帰属するものとし、ホームページ等に公開することがある。ただし、当該論文が第三者の著作権その他の権利の侵害問題を生じさせた場合、一切の責任は執筆者が負うものとする。なお、掲載された論文の執筆者は、無許諾かつ無償で当該著作物の再利用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活動報告】2023 年 4 月～2024 年 3 月

- (1)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研究」第 8 号刊行 2023 年 3 月 31 日
- (2) 2023 年度 第一回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協会理事会（オンライン）2023 年 4 月 9 日
- (3) 第五回「立思杯」2023 年度全国中日翻訳コンテスト（オンライン）

北京師範大学外国語文学学院日本語教育教學研究所、外文出版社、立思外国語学園の共催による第五回「立思杯」大学院生中日翻訳コンテストをオンラインで実施。大学教員・高校教員・大学院生の三つのグループに分け、2023 年 7 月 1 日エントリー開始、全国の高校・大学の若手教師、大学院生を対象 2023 年 8 月 19 日、大学教員が 17 名、高校教員が 28 名、大学院生が 160 名、合計 205 名がコンテストに参加。審査委員会が 2 度の審査を行い、入賞者が決定。2023 年 9 月 9 日に表彰式兼学術講演を行う。入賞者に賞状と記念品を贈る。外文出版社賈秋雅副書記、北京師範大学外文学院日本語教育教學研究所所長の冷麗敏教授、立思外国語学園の陳亜運学園長が主催者を代表してコメント。福建師範大学の林璋先生、国際関係学院の津田量先生、広東外語外貿大学の丁国旗先生、浙江工商大学の陳紅先生、独協大学の関久美子先生が審査員代表としてコメント。日中翻訳文化教育協会会長松岡榮志先生が審査委員会委員長として講評および翻訳講演を行う。
- (4) 2023 年度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協会 会員年次総会（オンライン）2023 年 8 月 27 日

一般社団法人日中翻訳文化教育協会の主催、林四郎博士記念東京漢字文化教育研究所の協賛による初のオンライン協会会員年次総会を開催。本協会の会員 60 名参加。学術講演と協会貢献者表彰式などを実施。

学術講演講師：

1 部 杜 勤（原上海理工大学教授）「中国日语 MTI 教育的現状と課題 —— 以翻译实践报告的撰写为中心」 司会：銭曉波

2 部 松岡榮志（東京学芸大学名誉教授）「私と辞書の 60 年」 司会：林 洪

表彰者：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発展貢献賞（二名）日中翻訳文化教育に貢献した方を表彰
林 璋（福建師範大学教授）
丁国旗（広東外語外貿大学教授）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奨励賞（一名）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研究』第七号に採用された論文の中から、優れた論文を表彰
楊潔冰（河南理工大学講師）「学生向けの通訳授業のコースデザインについて - 中国人中・上級日本語学習者を対象に」

【今後の活動予定】

- (1)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研究』第 9 号刊行 2024 年 3 月
- (2) 2024 年度 第一回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協会理事会 2024 年 4 月 14 日
※ 詳細レポートは協会ホームページ (<http://www.setacs.org/>) にてご覧ください。

一般社団法人日中翻訳文化教育協会会員規約（2015年4月1日施行）

第1条（代議員制の採用）

当協会には次の会員を置く。

- (1) 正会員：当協会の目的に賛同して、次条の規定により入会した大学の教員、もしくはそれに準ずる者。
- (2) 準会員：当協会の目的に賛同して、次条の規定により入会した大学院生、もしくはそれに準ずる者。
- (3) 団体会員：当協会の目的に賛同して、次条の規定により入会した研究所、研究・教育団体、その他民間団体。

第2条（入会手続き）

当協会への入会を希望する者は、所定の入会申請書類に必要事項を記入し、事務局を通じて理事長に提出し、理事の多数決による承認を受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前項の入会申請をするためには、正会員及び法人会員の場合は理事1名の推薦を要し、準会員は正会員1名の推薦を要するものとする。

入会后、申請内容に変更が生じた場合、会員は速やかに事務局へ届け出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3条（入会金及び会費）

当協会の事業活動運営費用に充てるため、会員は別途定める会費を納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既納会費は、いかなる事由があっても返還しない。

第4条（会員の資格取得）

会員の資格は、第2条の手続きの後、前条の会費を納入することにより取得するものとする。

第5条（会員の権利）

会員は、その種別に応じて次の権利を有する。

(1) 正会員は、当協会が発行する学術研究誌に投稿する資格を持つ。

(2) 準会員は、当協会が発行する季刊誌に投稿する資格を持つ。

(3) 正会員は、当協会が主催するセミナー等の講師を務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4) 正会員及び準会員は、当協会が主催するセミナー等に優先的に参加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5) 団体会員は、当協会の主催する事業に優先的にパートナーとして参与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第6条（任意退会）

会員は、理事長宛に退会届を提出することにより、任意に退会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第7条（除名）

会員が次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ときは、理事会の議決によって除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の際、当該会員に対して、理事会の1週間前までに理由を付して除名する旨を通知し、かつ理事会の場において弁明の機会を与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当協会の名誉を傷つける、又は当協会の目的に違反する行為があったとき。

(2) 当協会の定款または規則に違反したとき。

(3) その他除名すべき正当な事由があるとき。

前項により除名が決議されたときは、除名された会員に対して、理事長はその旨を通知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8条（会員資格の喪失）

前二条のほか、会員が次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場合は、その資格を喪失する。

(1) 当該年度末において会費が未納であるとき。

(2) 全ての理事の同意があったとき。

(3) 会員が死亡したとき。

(4) 団体である会員が解散したとき。

2024 年度役員

2024年4月1日予定

会 長	松岡榮志	副 会 長	侯仁鋒、徐一平	顧 問	章健、張中毅
常務理事	林洪、薛豹、高寧、杜勤、宮偉、関旭、周来友、李国棟、馮日珍、関久美子、坂口憲聡（事務局長）				
理 事	劉曉芳、范建明、李俄憲、施小煒、宮首弘子、林璋、陳多友、丁国旗、高仁德、陳慧玲、徐文智、祁福鼎、錢曉波、陳紅、楊鉄錚、武田法子、山口千佳、周洋、范文、陳亜運				
東京事務局	坂口憲聡、郡司祐弥	大連事務所	周洋	金華事務所	陳亜運

編集後記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研究』第9号をお届けします。本号は5篇の論文を掲載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2023年度は行動制限もなくなり、国際的な学术交流も以前の活気を取り戻すべく行なわれています。皆さまにお会いできること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

(郡司祐弥)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研究

No.9

2024年3月31日 印刷

2024年3月31日 発行

編集 一般社団法人 日中翻訳文化教育協会 (略称: SETACS)
(The Society of Education for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102-0073 東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 1-1-6 リブ九段 502

電話: 03-6380-9639 FAX: 03-6380-9649

メールアドレス: office@setacs.org

URL: <http://www.setacs.org/>

発行 両風堂

URL: <http://www.ryofudo.jp/>

印刷 株式会社杭城図文

〒310000 浙江省杭州市江乾区下沙街道益豊路 161 号創想邦 5 棟

©SETACS 2024